

为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贝尔纳·斯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 著

由丹尼尔·罗斯译为英文

(2009 年)

由公众号“思想格纳库”翻译为中文

目录:

埋首沙中：一个警告	1
引言.....	4
持存经济.....	4
文码化的进程.....	5
无产阶级的药理学.....	7
从商业到市场.....	7
哲学家、经济学与当代意识形态.....	8
“工作”的问题.....	10
1908—2008：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与消费主义的回应.....	12
柏拉图与无产阶级.....	15
无产阶级化即知识的丧失.....	19
无产阶级化与药理学.....	20
论工作.....	24
神经系统的无产阶级化、系统性愚蠢与新商业.....	24
闲暇与正外部性：间歇性.....	27
去团结化与负外部性.....	30
被黑手党扫除的资产阶级.....	32
前摄经济、永久革命与贡献.....	35
资本的药理学与贡献式经济.....	38
没有反趋势（counter-tendency），就不存在趋势	39
马克思所指的利润是投资回报率.....	40
利润、持续性与毒性.....	40
那些对资本药理学掉以轻心的人.....	41
创新、短期主义与投机.....	42
前摄经济.....	44
消费主义资本与「猴子货币」（monnaie de singe）：失序的数学化	46
短期主义微观趋势.....	47

作为系统性模式的股东资本主义.....	48
过度经济（dém mesure）与无限责任	48
所谓“保守主义革命”，实则是技术体系从属于经济体系的状态	50
技术体系、社会体系与市场营销.....	51
将技术体系与经济体系混为一谈，视为失序的主要因素.....	52
动机系统的崩溃.....	53
技术倾向的药理学.....	55
作为对宏观下行趋势之逆转[renversement]的贡献式经济	57
趋势的器官学及其转导性配置.....	59
提升趋势——“尽管存在诸多替代方案”	61
从驱力性虚空到趋势倒转.....	62
作为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新型关系的贡献式经济.....	63

献给阿尔诺·德·埃普特恩和克里斯蒂安·福雷

埋首沙中：一个警告

本手册中提出的论点最早于 2009 年 1 月 15 日在欧洲之家(Maison de l'Europe)发表，当时埃弗琳·格罗斯曼 (Évelyne Grossman) 与国际哲学学院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邀请我举办讲座。这些论点也在我为《工作：意义与关怀》(*Work: Meaning and Care*) 展览目录撰写的文章中进行了讨论——该展览由德国卫生博物馆 (Deutsches Hygiene-Museum)、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 (German Federal Cultural Foundation) 及丹尼尔·蒂拉代利斯 (Daniel Tyradellis) 发起，于 2009 年 6 月至 2010 年 3 月在德累斯顿举行。

我决定发表这些思考，正值全球围绕实施刺激计划的必要性而展开经济与政治辩论之际。这类计划旨在遏制资本主义工业世界首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破坏性影响。当下，在这类辩论中，“投资刺激”(investment stimulus) 与“消费刺激”(consumption stimulus) 常被作为对立概念提及，这实际上混淆了两个本应区分的问题。事实上，这两个问题需同时应对，却分属不同的时间维度。鉴于当前危机已预示消费主义模式的终结，这一挑战愈发艰巨。

那些主张将刺激消费作为经济复苏之路的人，既不愿听闻也不愿谈论消费主义的终结。然而，主张刺激投资的法国政府，与主张刺激消费的一方一样，都不愿质疑消费主义工业模式。法国版的“刺激投资”(由巴拉克·奥巴马提出时看似更为巧妙) 认为，拯救消费的最佳途径是通过投资，即恢复“盈利能力”，而这反过来又会重振建立在消费主义及其对应的市场驱动生产主义之上的企业家活力。

换言之，这种“投资”并未提出任何能够从工业模式崩溃中吸取教训的长远视角——该工业模式基于汽车、石油、高速公路网络建设，以及文化产业的“赫兹式网络”(Hertzien networks)。直至近期，这些产业仍构成消费主义的基础，但如今已完全过时，这一事实在 2008 年秋已清晰显现。换言之，这种“投资”根本不是投资：相反，它是一种“负投资”，是一种放弃，本质上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逃避。

这种“投资政策”除了重建消费主义模式之外别无他求，它是一种垂死意识

形态的体现——这种意识形态拼命试图延长一个已自我毁灭的模式的生命，尽可能长久地否认和掩盖以下事实：消费主义模式如今已具有巨大毒性（其毒性远超出“有毒资产”问题），因为它已抵达自身极限。这种否认本质上是在尽可能长久地维持那些能够剥削该模式的群体所积累的巨额利润。

消费主义模式已抵达其极限，因为它已沦为系统性的短期主义，还催生了一种“系统性愚蠢”（systemic stupidity）——从结构上阻碍了长期视野的重建。这种“投资”如果跳出纯粹会计学的范畴，根本算不上投资：它不过是对现状的纯粹重建，试图在丝毫不改变工业格局结构（更不用说其公理）的前提下重塑工业图景，全然寄希望于保护此前可实现的收入水平。

这或许是他们的希望，但这不过是掩耳盗铃者的虚妄之想。危机所引发的辩论，以及如何摆脱危机的问题，其真正焦点应当是如何克服这种短期主义——这种本质上摧毁一切真正投资（即对未来的投资）的短期主义，已从系统性层面（而非偶然地）将投资分解为投机。

为了避免重大经济灾难，并减轻危机造成的社会不公，我们是否必须刺激消费和现有经济机器——这一问题既紧迫又合理，但前提是此类政策不能以数千万欧元或美元为代价加剧局势，同时掩盖真正的核心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构建一种愿景和政治意愿，逐步脱离消费的经济政治综合体，转向新型投资体系。这种投资必须是社会与政治层面的投资，换言之，是对共同欲望的投资——即亚里士多德所称的“友爱”（*philia*），而这也构成新型经济投资的基础。

在显然迫使我们必须拯救当前局势的绝对紧迫性（避免全球经济危机演变为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军事冲突的全球政治危机），与产生一种能够突破现状的长期愿景的绝对必要性之间，显然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动态系统（在此指工业系统与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一旦开始变异就会出现典型特征。

这个问题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它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需要确切了解这种突变的具体内涵，以及它会引发哪些政治选择和工业选择：关键在于明确需要何种新的产业政策（至少在这一点上，巴拉克·奥巴马似乎比欧洲人略胜一筹——后者仍然擅长在否认现实的状态下维持运作）。

只有这样的回应才能同时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为挽救工业体系需要采取哪些紧迫而直接的措施，二是这些措施必须如何纳入一场堪称革命的经济与政治变革

——如果当一种模式已然走到尽头，那么唯有通过变革（舍此便无法避免彻底毁灭），才能构成真正的革命。

引言

持存经济

2001年，在《技术与时间 3：电影的时间与不适的问题》一书中，通过研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我主张进行一种新的批判：针对第三持存问题的批判，即记忆技术问题——更宽泛地说，是针对技术问题的批判。技术作为经验的物质化形态，始终构成一种超越意识的意识时间的空间化，因此，它即便不构成“无意识”（the unconscious），也构成了一种“无感知意识”（unconsciousness）。在此我希望表明，第三持存问题为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开辟了新视角，并且，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甚，它使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哲学的本质任务。

意识时间是由胡塞尔所谓的“持存”与“前摄”交织而成的^①。第一持存形成于时间流逝的过程本身——在时间的进程中，当一个当下时刻流逝时，它通过对自身流逝的直接而原初的持存（即“第一持存”）而被构成。当这个当下成为过去，它便作为第二持存而被建构，亦即作为所有那些记忆内容（souvenirs）——它们共同编织成我们记忆（mémoire）的脉络。

第三持存是第二持存的记忆技术外化，而第二持存本身则由第一持存所生成。但从安德烈·勒鲁瓦-古兰（André Leroi-Gouihan）描述为“外在化过程”的人类化进程之初，所有技术客体便构成了记忆的代际支撑——作为物质文化，它过度决定了学习（apprentissage）与记忆活动。因此，第三持存始终先于第一持存和第二持存的构成而存在。新生儿降临的世界中，第三持存既先于他而存在，又等待着他的到来，而恰恰是这种持存，构成了作为“世界”的世界。作为个体时间由此转化为集体时间的空间化过程，第三持存是心智（esprit）的原初外化。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记忆技术的持存层不断转变，其复杂性与密度均与日俱增。这一过程尤其催生了对第一持存流与第二持存流的分析性记录系统——例如书写与计数系统，而这些系统构成了日益精细化的第三持存系统。逻各斯（logos）

^① 这些概念建立于《技术与时间 3：电影的时间与不适的问题》（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01年）简要概述可参见与埃利·杜林合著的《意外的哲学思考》（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04年），第74页起。

正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通过将语言的连续流离散化并进行空间化处理，使其可被分析性地审视，进而迈入其区分性时代——从根本且特定的意义上说，逻辑学正是由此发端。但这种“流”的离散化同样影响了手势动作。手势的离散化在雅克·德·沃康松（Jacques de Vaucanson）的自动化技术应用于雅卡尔织机（Jacquard loom）时获得了具体体现，并在工业革命中以技术形态得以普及。

在此，手势（如同语言）必须被视为一种持存流，即手势的连续链条（*enchaînement*），而手工艺的学习（*apprentissage*）就在于生成手势的第二持存。然而，手势时间的离散化与空间化再现构成了技术自动化——在此过程中，可被分析性再现为第三持存的已不再是灵魂的逻各斯，而是身体的手势。这种可再现性产生了可被称为“文码”（*grammes*）的持存颗粒。正因如此，我们主张：从新石器时代至今，第三持存的演化构成了一个文码化（*grammatization*）的过程。

在 19 世纪的进程中，将视听感知文码化的技术得以出现，通过这些技术，感官器官的流动被离散化。此后，所有认知、心理运动和审美功能均因文码化过程而发生转变。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审视，这意味着概念化、生产和消费功能被文码化——并因此被纳入一种致力于生产由持存系统所控制的第三持存的装置之中^①。

文码化的进程

我希望表明：

- 在文码化进程中产生的第三持存问题，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无产阶级化的条件；
-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未知的文码化新形式，构成了无产阶级化的新形式；
-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哲学的首要任务。

这本小书旨在简要阐述构成这种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的若干思考，围绕若干核心问题展开，以期与马克思展开对话，并探讨当今的劳动与工作问题——鉴于劳动（随人类定居化首次出现）始终受限于特定时代的文码化发展状态，而当

^① 参见《技术与时间 3》

下的文码化正经历着字面意义上的革命性新发展。

这一论述的核心要点如下：

- 生产问题，在我们正迈入一个新的经济与工业时代之际——面对文码化的最新发展，这个时代重新提出了劳动定义的问题；

- 消费问题，以及马克思未能预见的方面——即消费在 20 世纪如何与欲望及其经济形成一种本质联系而被重新配置：通过通向想象界（即幻想）的路径，进而通向无意识，并通过与驱动力的物质相绑定而实现转化；

- 无产阶级问题，关于这一概念的理解与拓展，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运用与误用，其被遗忘的状况，以及其在当今的重大意义；

- 工业问题及其在人类生成中的印记，二者将以文码化视角进行审视；

- 外部性问题，鉴于工业化本身即为文码化进程，此类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始终处于持续重构状态，以及它们与跨个体化（即与商业）的关系；

- 在新的无产阶级化框架下的社会阶级问题，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的消失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的黑手党化所涉及的利害关系。

无产阶级的药理学

从商业到市场

一百五十年前，即 1859 年 1 月，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因此，当我在此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新的批判时，也是在纪念这一时刻。但同时，我也要向《新批判》(*La Nouvelle Critique*) 杂志致敬——2008 年 9 月，我在《人道报》(*L'Humanité*)^①主办的年度活动中曾谈及这份杂志，它在我作为青少年和年轻激进分子的个人历史中占据特殊地位：正是在这份法国共产党刊物的字里行间，我首次接触到精神分析、语言学、人类学和哲学。

终于——尤其重要的是，在**今天**谈论新的**批判**时，我正与一个完全属于我自身知识脉络的传统展开论战性对话。这一传统源自 20 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哲学，作为后结构主义（这可以追溯到《批评文集》的作者巴特——我同样是在《新批判》杂志上首次听闻他的思想），它主张“批判”是一个与形而上学不可分割的概念，认为批判在根本上自身就是形而上学的；并由此提出，相较于“批判”，今后更应致力于“解构”。

在我看来，解构依然是一种批判，而且正因如此，它始终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这一切并非完全清晰，我想说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解构未能批判其对“批判”的批判——也就是说，未能批判“批判的历史形态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这一主张。换言之，它尚未阐明：**如果批判不再建立于一套对立体系之上**，它可能会呈现何种形态。

当我说必须**重新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我的意思是什么？首先，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我不会对这个问题给出任何详尽的回答——吉多·伯恩斯（Gido Berns）已对其进行过细致探讨。我仅想指出，尽管伯恩斯将安托万·德·蒙克莱斯钦（Antoine de Montchrestien）1615 年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即“超越

^① 工业之艺（Ars Industrialis）网站上有一档播客可供收听：<http://www.arsindustrialis.org>

家庭(oikos)内部范畴的经济”)与阿诺尔德(Arnould)1791年在著作中阐述的“商业问题”相关联,但在本书中,如果工业化与机械化确实创造了不同于传统市场交换的新形式,那么此处讨论的政治经济学已不再严格局限于“商业”范畴。因为商业作为一种交换形式,无法被简化为工业化进程中市场所发生的变化。

商业始终是“技艺之道”(savoir-faire)(即“关于如何去制作或操作的知识”)与“生活智慧”(savoir-vivre)(即“关于如何生活的知识”)的交换。此外,法语中的“商业”(commerce)在同样意义上还可指称“交谈”,更广义地说,指向一切富有成效的社会关系形式。然而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市场却预设了“实践知识”与“生活智慧”的双重消亡。(关于商业与市场的区别,弗朗克·阿热里(Franck Aggeri)、奥利维耶·法沃罗(Olivier Favereau)与阿尔芒·阿絮埃(Armand Hatchuel)近期在塞里西拉塞勒(Cerisy-la-Salle)举办的题为“无市场的商业活动?”(*L'activité marchande sans le marché?*)的研讨会上已作出确认与探讨。)^①

哲学家、经济学与当代意识形态

2008年春,埃弗利娜·格罗斯曼(Évelyne Grossman)邀请我至国际哲学学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发言,我提议以构成本书标题的主题作为演讲内容,因为我确信我们正濒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一场本质上呼唤着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危机。关于这场危机的具体分析,我在《终结恶性增长:来自工业之艺的若干思考》(*Pour en finir avec la mécroissance: Quelques propositions d'Ars Industrialis*)^②中进行了更细致的阐述。

然而,选择这一主题发言还有另一个原因:鉴于在当代哲学领域,关于政治话语的现状极少(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时候)引发讨论——在我这一代及上一代法国哲学家中(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③,他们对当代经济完全是无话可说的,仿佛自二战结束以来这个领域从未出现任何新事物;又或者,仿佛在“经济主义”(即臭名昭著的“经济人”所代表的经济主义,如今已沦为可耻的概念)诞生之

^① 参见 <http://www.ccic-cerisy.asso.fr/activitemarchande08.html>

^② Christian Fauré, Alain Giffard, Bernard Stiegler, *Pour en finir avec la mécroissance: Quelques propositions d'Ars Industrialis* (Paris: Flammarion, 2009).

^③ 尤其是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

后，哲学就被禁止介入经济学领域——这种经济主义甚至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消解了“政治维度”），并导致了我們如今意识到的所有严重错误。我希望借此在当代哲学界激起一场关于其政治话语状态的讨论。

因此，我在此试图与那些来自 20 世纪思想传统的人们展开对话。但我尤其希望邀请他们的读者——在这些读者中，既有不同于我的年轻哲学家，也有那些并非以哲学为职业，却因将哲学作为其闲暇之业（*otium*）而研习哲学的人；所有那些并非职业哲学家，却身为哲学爱好者（*amateurs*）——作为爱智慧者，他们本质上正是真正的哲学家。

在开启这场交流之际，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已放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这堪称一场灾难性的转向。因为尽管经济主义确实导致了可怕的后果，然而对当代经济缺乏批判不仅会催生新的灾难，同时也让下一代在悲剧性的意义上毫无准备。至于哲学在经济学领域的这种退位——它是许多人所持态度的特征，本质上是放弃了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思考，且与政治家放弃“反抗破坏法则之现状”的理念互为表里——这种退位源于某种对“批判”的特定关系，或更确切地说，源于一种“非关系”，以至于它导致了与当代经济学的脱节——而这种脱节往往被一种对探讨过去经济学的哲学文本的沉迷所掩盖。

现在，这种“非关系”——它已然成为一种遮蔽，甚至堪称彻底的否定——在很大程度上，亦是由那些促使金融家、实业家、技术官僚与政治家将某些状况内化为“既定现实”的相同进程所催生的。然而这些状况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人为建构，它们终将不可避免地抵达自身极限，而届时，我们将有必要依照康德赋予这个词的意义，对这些极限展开批判。这些进程构成了曾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如今，这种意识形态正开始以其本来面目显现——多亏这些极限以非常残酷的方式暴露出来。然而，面对此类问题，哲学几乎完全保持沉默。

将政治经济学作为在工业社会条件下演变为**交换的商业**来思考与批判——即作为服从于**劳动之变革**、生产与消费过程之功能化、**社会关系之必然功能化**（以至于离开了机械技术便无法想象）的商业——需要以考察经济学与政治学为目标，并在二者不可分割的意义上对其展开讨论^①。

^① 这将有悖于一种受对汉娜·阿伦特轻率解读所启发的幻想，该幻想试图将“政治因素”从任何经济因素中彻底剥离

至于法国哲学家的政治话语，他们几乎不谈经济学。他们谈论移民、欧洲或民主，但不谈资本、劳动、工业或市场营销。至于那些从哲学角度探讨工作与劳动的人，确实有那么几位，他们的观点既有趣又重要，但总体而言他们并非哲学家：而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计算机科学家。

“工作”的问题

面对自动化和数字化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及其引发的失业问题，20 世纪末曾展开过一场关于“工作分担”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重大辩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法国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政府在社会事务部长玛蒂娜·奥布里的主导下，通过了一项将每周工作时间限制为 35 小时的法律。

这项法律的制定灵感源自 1995 年发表的两项研究：其一是美国学者杰瑞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的著作（该书法语译本由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作序）^①，其二是法国学者多米尼克·梅达（Dominique Méda）的研究^②——后者尤其受到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著作的影响，特别是其《劳动的蜕变：对经济理性的批判》（*Métamorphoses du travail: Critique de la raison économique*）^③。后来，在 2002 年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当选后，文化部长让-雅克·艾拉贡（Jean-Jacques Aillagon）首先针对法国失业福利机构 Unédic 的角色，以及规定戏剧和电影行业临时工人（*intermittents du spectacle*）领取失业救济金条件的法律提出了质疑。这进而促使安东内拉·科尔萨尼（Antonella Corsani）与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再次着手探讨“工作”问题^④。

在此期间，随着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兴起，新的工作实践应运而生。针

^① 参见 Jeremy Rifkin, *The Decline of the Global Labor Force and the Dawn of the Post-Market Era* (New York: Putnam Books, 1995). 以及 Michel Rocard “Preface” to Rifkin, *La Fin du travail*, P. Rouv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6).

^② Dominique Méda, *Travail : Une valeur en voie de dispersion* (Paris: Aubier, 1995).

^③ André Gorz, *Métamorphoses du travail. Critique de la raison économique* (Paris: Gallimard, 2004). In English,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trans. C. Turner and G. Handyside (London: Verso, 1989).

^④ Antonella Corsani and Maurizio Lazzarato, *Intermittents et précaires* (Paris: Amsterdam, 2008).

对这些实践，法国及其他地区涌现出诸多创新论述——这些论述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在此期间，随着数字技术与网状技术的兴起，新的工作实践应运而生。针对这些实践，法国及其他地区涌现出诸多创新论述——这些论述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工作”的定义，尤其是当工作与我所描述的“药”（*pharmakon*），以及“记忆辅助药剂”（*hypomnesic pharmakon*）相关联时。所谓“记忆辅助药剂”，即作为第三持存的**精神技术**：当它遭遇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所称的“抽象”^①时，既可能导致心智生活的无产阶级化，也可能推动其批判强度的提升。这些新工作实践深刻质疑了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工业时代的劳动分配方式——《大众》（*Multitudes*）杂志及其主编扬·穆利耶-布唐（Yann Moulier-Boutang）曾频繁提出此类质疑，由此开启了对“贡献式经济”的探讨，并为“财产权”问题注入了新的活力。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个从里夫金到拉扎拉托重新浮现的重要提议——最初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提议——在全球危机期间再次出现时，更是以新的力度被提出：即实施一种允许为非薪资工作提供报酬的负所得税构想。此外，科尔萨尼与拉扎拉托指出，法国戏剧和电影行业临时及散工现行的福利制度，正是此类负所得税制度的一个实例。

但正如佩卡·希马内姆（Pekka Himanem）^②和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所称的“黑客”群体发明的所有新工作实践一样，这一提议再次有力地提出了“就业之外的工作时间”问题——而将每周工作时间缩减至 35 小时的法律曾完全忽视这一问题，正如它忽视了消费主义工业模式的穷途末路。在该模式中，生产与消费构成一种功能性对立，但这种对立如今已过时^③。

^① McKenzie Wark, *A Hacker Manifesto*(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Pekka Himanen, *The Hacker Ethic: A Radical Approach to the Philosophy of Business*(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③ 关于工作的新问题也关乎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是年轻一代诉求的典型特征。我在《远程统治对抗民主》（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2006 年）（*La Télécratie contre la démocratie*）中提出，法国学生针对 CPE（首次就业合同）的抗议，首先是对“工作”与“就业”混淆的抗议：“并非所有就业都是工作：并非所有职业都有助于知识的获取与发展，并由此推动个体化——即作为生产者在社会中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过程，而不仅仅是作为通过工作获得工资、进而拥有购买力的消费者。相反，个体化正是将工作超越单纯就业的要素——如果我们理解‘工作’在于基于对世界的认知去行动以改变世界。然而，在第二产业

如今，在我们经历一场异常剧烈的全球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似乎标志着一个漫长的工业与经济周期之终结^①——之际，我们还能以同样的方式提出“工作”问题吗？鉴于过去一个世纪里，“工作”本质上是依照一种基于生产与消费耦合的工业模式而被构想的，而恰恰是这一功能性组合如今似乎已穷尽其可能性，那么业已发生的消费主义模式的震荡，难道没有深刻改变工作的核心议题、甚至其定义本身吗？^②从当前危机及其对古典工作形式的破坏性影响出发，科尔萨尼与拉扎拉托的研究恰恰提出了这一问题。

1908—2008：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与消费主义的回应

19 世纪以蒸汽机和铁路网络铁轨为基础的生产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让位于以钢铁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和公路网络为基础的消费主义模式。然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一百五十年后，这种已全球化的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工业模式实际上已然解体——而它的解体程度，恰好与其在经济和功能上实现生产与消费的整合程度成正比。

如果说 1908 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通过推出 T 型车发明了一种看似能对抗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新工业模式^③，那么在 2008 年，福特汽车公司的市值却缩水了四分之三——与此同时，建立在碳氢化合物消费基础上、属于“碳时代”与流动性的公路网络，正被“轻时”数字网络和“超物质经济”的发展所取代^④。这些问题在《终结微增长》（*Pour en finir avec la mécroissance*）一书中已得到详细分析^⑤。

和第三产业中，由于受“文码化”影响，工作日益成为与工资相关的事务，如今它大多被简化为在就业中度过的时间：这正是“分离环境”扩散的结果，而这种扩散本身正是工业革命所包含的生产手势与生产方式“文码化”的首要后果”（《远程统治对抗民主》，第 243-244 页）。我将在后续内容中更详细地探讨这些问题。

^① 正是这一“同时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论及周期理论时或许有所忽视。

^② 在《终结微增长》（*Pour en finir avec la mécroissance*）一书中，我试图描述这种枯竭的负面动态。

^③ 也就是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固定资本构成（生产资料）的增加与可变资本（工资劳动）的相应减少，是投资利润率下降的结果。

^④ Bernard Stiegler, *Économie de l'hypermateriel et du psychopouvoir. Entretiens avec Philippe Petit et Vincent Bontens* (Paris: Mille et une nuits, 2008).

^⑤ 参见《终结微增长》

正是在这样一个由接入电子网络和数字自动化等问题所主导的“轻时”语境中，杰里米·里夫金提出了以下假设：

到 2050 年，在传统工业领域或许仅需低至 5% 的成年人便可参与管理和运营^①。

为什么里夫金及其他思考工作问题的学者未能分析他们所谓的“工作的终结”与利润率趋势性下降之间的关联？为何在 1968 年之后——尤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即“保守革命”之后）——人们频繁宣称马克思在提出这一论点时犯了错误？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测，随着劳动力（即可变资本）的作用在全球生产经济中因生产力提升而减弱，资本主义——或所谓的市场经济——将迅速抵达其极限。如今我们知道，20 世纪 90 年代关注工作问题的人士一致认为，生产力提升必然会导致“工作的终结”，但他们似乎也认同“保守革命”之后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普遍观点，即资本主义的动态机制已经**克服**了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

没有什么比这更错误的了，而马克思实际上远非错误。简而言之，近期的危机正是这种系统性趋势的结果。然而，马克思无法预见一种**新能量**的剥削与功能化所扮演的角色——这种能量既不是无产阶级化生产者的能量（作为纯粹劳动力的劳动），也不是新工业装置的动力能源（如服务于钢铁工业和文化产业的石油与电力），而是**无产阶级化消费者**的能量——即消费者的**力比多**能量。对这种能量的剥削改变了力比多经济，并随之改变了**整个经济**，直至前者像后者一样被摧毁，且正是**由后者摧毁了前者**。

换言之，马克思未能预见消费问题在 20 世纪出现的方式，以及这种出现如何改变了他试图在《资本论》中描绘的图景。当然，马克思确实探讨过消费问题，而且频繁论及。例如，可参看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以下段落：

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 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方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

^① Jeremy Rifkin, *The Age of Access: The New Culture of Hypercapitalism Where All of Life Is a Paid-for Experience* (New York: Putnam, 2000), p. 9.

产。[...]经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①

尤其是：

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②

马克思在此以某种方式强调了**消费关系**的问题——这提出了我将在下文描述为**跨个体化过程**的问题。

然而，消费问题未能使他思考一种**新的无产阶级化形式**——这种形式在于**组织消费、摧毁生活智慧**（savoir-vivre），以创造可用的购买力，进而细化并强化那个曾以**摧毁技艺之道**（savoir-faire）来创造可用劳动力的系统。换言之，马克思未能预见，在 20 世纪以资本主义力比多经济形式出现的现象，**既可能延缓、也可能加剧利润率趋势性下降所带来的影响**。

这正是居伊·德波（Guy Debord）提出的问题——他将无产阶级化的概念（即对屈从于商品时间的人类时间的剥夺）扩展到了消费者形象上^③。然而，德波未能将资本主义体系的这一变化与下文将讨论的外化技术的药理学问题联系起来。

只有通过弗洛伊德及其理论在市场营销对无意识理论的应用（尤其是由其侄子爱德华·伯奈斯 [Edward Bernays] 推动的那些应用——正如亚当·柯蒂斯 [Adam Curtis] 在 2002 年纪录片《自我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Self*] 中所揭示的，伯奈斯在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扮演了关键角色），才能真正理解这一问题。尽管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密不可分，但关注“工作问题”的研究者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在回到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更深入地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1-3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3 页。

^③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New York: Zone Books, 1995), p. 159.

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本质：根据他们的观点，劳动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根本性变革；而在我看来，这一过程同时也是消费主义得以成立的可能性条件，因为消费主义必然包含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

尽管这或许令人惊讶，但在此有必要回到哲学的本源，回到哲学与诡辩术的斗争之后，进而提出：第一位思考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在思考无产阶级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这么做，但恰恰因此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无产阶级的可能性——正是柏拉图。

柏拉图与无产阶级

雅克·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①中，基于对《斐德若篇》的解读展开了其形而上学解构计划的重要部分：他揭示了这篇对话如何将哲学的“回忆”（*anamnesis*，即对存在之真理的记忆）与诡辩的“助忆术”（*hypomnesis*，即记忆术，尤其指作为幻觉制造者和心智操纵技术的书写）相对立；并根据他在《论文字学》中称为“作为痕迹的增补之逻辑”指出，根本无法将“内在”（回忆）与“外在”（助忆术）对立起来——无法将“活的记忆”与助忆术的“死的记忆”对立起来，而福柯晚期对这种“死的记忆”深感兴趣，正是它将“活的记忆”构成为“学问化的记忆”（*savante*）。这种不可能性开启了“药理学问题”：根据这一问题，助忆术是一种 **pharmakon**（药理学物）——它既是毒药，也是解药。

如今，苏格拉底在《斐德若篇》中所描述的“记忆的外化是记忆与知识的丧失”，已成为我们生存各个层面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且越来越频繁地，在我们的无力感（*impuissance*）——若还算不上无能（*impotence*）甚至过时感中显现出来——恰恰就在数字网络非凡的记忆能力使我们意识到人类记忆之浩瀚的时刻，这种记忆似乎已变得无限可恢复和可获取。

工业助忆装置的普及使我们的记忆转入到机器之中，例如，我们不再知道亲近之人的电话号码——而拼写检查工具的普及则引发了人们对正字法意识终结的担忧，对与之相伴的文学性助忆语言知识终结的担忧，以及随之对语言的回忆性知识终结的担忧。

^①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trans.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61-171.

如今，这等同于我在此想要阐述的一个宏大进程中日常且可感知的层面——即**认知与情感的无产阶级化**进程，以及一个知识（技艺之道、生活智慧、理论知识）丧失的宏大进程：**倘若失去这些知识，所有的意义都将荡然无存。**

当外在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技术问题（即人类通过自我生产实现自我构成这一问题）之根源的外在化——抵达记忆与知识的外化走向超工业化的阶段时，它既无限制地扩展了**助忆环境**的力量，也使其沦为可控之物：**被控制社会的认知产业与文化产业**所控制——这些产业如今将神经化学活动与核苷酸序列形式化，从而将记忆与知识的神经生物学基底铭刻进一个必须被分析为“**文码化**”（即离散化，以及由此从连续体中抽象出来）的**历史进程**之中。这一历史的最新阶段是生物技术阶段，而下一阶段则是纳米技术阶段。由此产生了关于生物政治、心理政治、社会政治与技术政治的工业经济问题，最终则指向一种记忆的**神经政治**工业经济问题。

正是随着记忆术的出现，作为技术生成的外化过程明确成为一段文码化的历史。文码化进程是**记忆的技术史**，其中助忆记忆持续在回忆记忆内部引入一种**张力的建构**。这种回忆性张力以外化的心智作品（或精神作品）形式呈现，各个时代的心理社会**个体化与去个体化**进程正是通过这种形式被药理学式地建构起来。

文码化是将编织我们生存的流动与连续性进行离散化的过程。作为言语流动之离散化的书写，便是文码化的一个**阶段**。而文码化发生于一种器官学（*organologie*）内部——《反俄狄浦斯》已经引入了这一器官学问题：

原始领地机器编码“流”、占据器官并标记身体。[...] [T] 充分行使其权利与义务的人，在一种将其器官及其功能交托给集体的体制下，全身都被烙上印记 [...]。因为正是通过这一奠基性的行为——将器官“嵌入社会体”（*hewn into the socius*），让“流”在其表面流淌——人类不再是生物有机体，而成为一个“完整身体”（*full body*）、一片“大地”（*earth*），其器官附着于斯，在其上受社会体的要求所吸引、排斥、奇迹般地运作。尼采说：问题在于为人类“创造一种记忆”；而人类，本由“主动遗忘的能力”（*oubli*）——即对生物记忆的压抑——所构成，必须创造另一种记忆，一种集体的记忆 [...]。“或许在人类整个史前史中，没有什么比其‘记忆术’（*mnemotechnics*）更可怕、更诡异的了。”^①

^①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trans.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如今，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构成记忆术历史的文码化进程**突然超越了语言领域**——亦即德勒兹与瓜塔里在一种本质性、源初性关联中为其确立的**逻各斯领域**^①：文码化进程开始占据身体。首先，它将生产者的**手势**离散化，旨在使其能够被**自动复制**——而恰在同一时期，那些复制可见与可听之物的机器和装置也应运而生（它们曾深深吸引瓦尔特·本雅明的关注），这些机器与装置将感知文码化，并借此将神经系统的情感活动文码化。

手势的文码化——即马克思所描述的无产阶级化（亦即**技艺之道丧失**）的基础——随着电子与数字设备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直至**所有**形式的知识都通过认知与文化记忆技术被文码化。这既包括语言知识转化为自动语言处理技术与产业的过程，也涵盖生活智慧（即广义的行为方式）——从用户画像到情感的文码化——所有这一切都将导向超工业**服务经济**的“认知”与“文化”资本主义。

文码化是所有形式记忆外在化的历史：神经与大脑记忆、身体与肌肉记忆、生物遗传记忆。当记忆通过技术实现外在化时，它可能通过社会组织经济投入成为社会政治与生物政治控制的对象——这些组织从而通过记忆技术器官的中介作用**重塑心理组织**。记忆技术器官既包括机器工具（亚当·斯密早在 1776 年就分析过机器对工人心智的影响）与一切自动化装置（从家用电器到即将席卷超工业市场的“物联网”及通信设备），也包括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与西莉亚·卢瑞（Celia Lury）所描述的“物役化”^②借之开启**新转向**^③的助忆客体。

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文码化的思考需要一种**普遍器官学**——即关于以下三者衔接关系的理论：身体器官（大脑、手、眼、触觉、舌头、生殖器官、内脏、神经 - 植物性系统等）、人工器官（工具、器械及文码化的技术支撑）以及社会器官（人类群体，如家庭、氏族、族群、政治机构与社会、企业与经济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广义上的社会系统——无论它们是否经历去领地化，也不论其属于法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p. 144-5.

^① [一种]词语的记忆（paroles），而非事物的记忆；符号的记忆，而非实效的记忆”，*Anti-Oedipus*, p. 144.

^② Scott Lash and Celia Lury,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London: Polity, 2007)

^③ 读者可查阅国际电信联盟的报告：

<http://www.itu.int/itu-news/manager/d.isplay.asp?lang=en&year=2005&issue=09&ipage=things&ext=html>。

律、语言、宗教、政治、财政、经济等何种领域)①。

在超工业时代，若我们从这种**普遍器官学**（旨在建立一种**政治器官学**、**经济器官学**与**审美器官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斐德若篇》中关于助忆客体的问题，便会发现：柏拉图提出的“助忆”问题实则构成了“无产阶级化”思考的最初版本——因为事实上，无产阶级正是那些因失去记忆而失去知识的经济行动者：他们的记忆已融入复制手势的机器，而这些手势无需无产阶级再去掌握——他们只需为这台复制机器服务，由此再度沦为农奴。

在今天考察技术记忆问题，意味着**重新开启关于“助忆”的追问**——它不仅是“无产阶级化”的问题，更涉及一个文码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消费者从此被服务业及其装置剥夺了记忆与知识**。我们将看到，这如何在**跨个体化**过程中造成短路。在今天考察技术记忆问题，意味着探究由助忆技术扩散所引发的“普遍无产阶级化”阶段。

柏拉图的真理或将在马克思那里被寻得，但唯有在得出两个补充结论的条件下才成立：

- 马克思本人未能思考技术与人类生存的助忆特性，这解释了他为何无法将人类生命视为“**生存**”（ex-istence），并因此像柏拉图一样，继续将“死”与“生”对立了起来的原因。

- 哲学围绕记忆及其技术化问题与诡辩术展开的**初始**斗争，从一开始便构成了哲学所承载的政治斗争的核心。因此，对柏拉图著作中“助忆”（hypomnesis）之地位的重新评估，以及德里达所提议的对柏拉图助忆论述的解构，必须成为哲学更新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的基础——在这一批判中，**技术成为核心议题**，并提出了器官学、药理学与治疗学的三重问题：由此产生的是社会治疗术的问题②（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即属此列），而文码化正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动态程序。

① 文码化是居伊·德波所谓“物化意识形态”的可能性条件（参见《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第212-213页）。但德波并未思考文码化本身，亦未思考其**药理学特征**，而这构成了他思想中的一个阻滞。

② *Méci'énance et discrédit 3. L'esprit perdu du capitalisme* (Paris: Galilée, 2006).

无产阶级化即知识的丧失

吉尔伯特·西蒙东指出，无产阶级是**去个体化**的工人——其知识已融入机器，以至于不再是通过掌握工具并付诸实践而实现个体化的劳动者。相反，劳动者为机器工具服务，而机器工具本身已成为技术个体（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在机器工具及其所属的技术系统内部，个体化过程得以发生）。根据西蒙东的观点，这种技术个体化是一个具体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工业客体系统实现功能整合并由此转型——社会技术环境亦然。然而，无产阶级化的劳动者实则被排除在这一转型之外：他们与转型相**分离**，而非相**联结**。这样的劳动者并未经历共同个体化，他们并未真正“存在”（*ex-ist*）。

这种分离实际上是**构成劳动环境之跨个体化结构**的断裂，也构成了所有象征环境，因为劳动显然也是一种**象征环境**。在协作劳动环境中，工人们通过劳动塑造了一种经验，在这种经验中，他们推动自身所处的环境不断演化——例如他们的工具、使用工具的方式，当然还有工具使用的产物。他们**开启**[*ouvrent*]了这个自己作为工人（*ouvriers*）所身处的环境。无产阶级化正是这样一种过程：它将生产者排除在生产条件的演化及其劳动所依赖的条件之外。

换言之，无产阶级化是一个知识丧失的过程——这同时也是意义感与生存性的丧失——它由文码化所催生，因为文码化导致了跨个体化进程的短路。在正常的跨个体化进程中，工人通过劳动实现自身个体化（即通过学习），并由此使他们的工作环境实现个体化。正是这种“短路”构成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 1848 年《共产党宣言》中界定的“无产阶级化”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即通过知识丧失来界定的无产阶级化：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就越收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①

这种消耗正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称的劳动力，它自此不再是一种知识，而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38-39 页。

沦为了商品。工人从工具的承载者与器具的使用者，自身变成了服务于“承载工具的机器”的工具与器具。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明确指出的，这是**所有**生产者的命运，而不仅限于工人：

以前的中间阶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的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①

当然，无论是在《共产党宣言》还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②以及《资本论》中，无产阶级始终被描述为恰好由工人阶级构成。但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一种历史事实状态——它与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从任何意义上说均属“原始”阶段）**即文码化**的原始阶段相绑定，而这一状态注定会发生显著演变：它将把所有知识被助忆过程吸收的人纳入无产阶级化进程，这些助忆过程不仅存在于机器中，还存在于装置、专家系统、服务、网络以及各类技术客体与系统之中。

无产阶级化与药理学

无产阶级并非工人阶级。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因对二者的混淆而误解了马克思。一个典型例证可见于雅克·朗西埃的《劳工之夜：19世纪法国工人的梦想》^③。但另一方面——且尤为重要的是一——文码化通过实现对消费者注意力的驾驭（*captation*），并借此驾驭其力比多能量，同样使其无产阶级化成为可能：它摧毁的不仅是消费者的技艺之道，更是他们的生活智慧。消费者的这种无产阶级化，通过开辟能够抵御利润率趋降趋势的大众市场，使消费者获得**购买力**（而非仅仅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成为可能，并从根本上和实践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问题在于，到20世纪末，那些必然被重新分配给已成为消费者的无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9页。

^② 即马克思《1857-1858经济学手稿》，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被称为“大纲”——译者注。

^③ Jacques Rancière, *The Nights of Labor: The Workers' Dream in 19th Century France*, trans. John Dru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化生产者的剩余价值，导致了他们力比多能量的破坏，并使其分解为零散的欲望——这正是赫伯特·马尔库塞所称的“去升华”（desublimation）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展开对力比多经济的批判：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必要，还必须同时构成对力比多经济的药理学批判。

弗洛伊德理论唯有在直面以下问题时，才能推动这些议题的进展：作为拜物教的**药理学**问题，以及通过分析**助忆机制**（hypomnesic）^①在欲望与升华历史中的作用而显现的、改造了拜物教的**文码化**问题——在此过程中，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成为一种原始助忆器（proto-hypomnematon）与原始拜物教载体（proto-fetish）^②，而当代的助忆客体则是将各类网络联结为一体的**助忆工具**（hypomnemata）。

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标志着力比多经济的一个时代，而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项关键任务在于构建这一经济的**发生学**——它同时也是一种药理学，其起源与器官学生成及文码化密不可分。如今，这种药理学提出了**跨个体化**的问题，因为它**既能产生个体化的长链，也能导致短路**（即去个体化）。

因此，柏拉图所谓的**回忆**（anamnesis）莫基于一种**辩证法**，而这是一种**对话性的交流**——在对话交流（interlocution）中，即在我所理解的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主义**”（dialogism）^③中，跨个体化长链才得以形成；然而，智者对这种文字**药理学**（literal pharmakon）的有害使用，却往往导致这些长链发生短路。

更普遍地说，若感知与神经系统（作为情感的载体）的文码化可能导致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即摧毁他们的生活智慧及其所能带来的诸种意趣，这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力比多经济在跨个体化进程中构成了欲望回路：力比多能量通过这一进程得以形成与积累，但文码化在这一进程中亦可能呈现两种走向：

^① **助忆术**（Hypomnemata）即记忆技术，亦可称为**助忆药理学**（hypomnesic pharmaka）。米歇尔·福柯指出，它们在“闲暇”（otium）的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更广泛地说，在他称为“**自我技术**”（techniques of the self）的升华过程中亦是如此。关于这些问题，可参见 *Mécréance et discrédit I. La décadence des démocraties industrielles* (Paris: Galilée, 2004), p.107, 即将由 Polity 出版英文版，以及斯蒂格勒与工业之艺（Ars Industrialis）合著的 *Réenchâter le monde: La valeur esprit contre le populisme industriel* (Paris: Flammarion, 2006), p.31, 即将由 Continuum 出版英文版。

^② Paul-Laurent Assoun, *Le Fétichisme* (Paris: PUF, 2006).

^③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与西蒙东的语言个体化构想相近：任何心理语言学层面的个体化，若不同时构成社会语言学层面的个体化，便无法发生。

• 形成长链，即通过**强化个体化来积累力比多能量**，并为个体提供使其个体化无限化的欲望客体（西蒙东指出，个体化在结构上是未完成的，因此具有无限性）——因为这些客体只能**作为无限的、不可通约的存在**被给予；或者是

• 引发短路（即去个体化），并进而导致去升华——即**所有事物的可通约有限化**，最终造成力比多能量的毁灭。

文码化具有**不可还原的**药理学属性，因此，**助忆工具**要么能够：

• 使其所影响的**心理**无产阶级化；或者是

• 通过将心理纳入其连接的跨个体化新回路并使其个体化——在这一回路中，与柏拉图所理解的**回忆**（anamnesis）相关的长链得以形成：这种回忆作为一种回路，通向一种基于理念投射的真理，即基于某种一致性（consistence）的真理——该理念作为客体并不存在，因为它在构成可通约秩序的现存物中没有任何根基，但它恰恰是**欲望的对象**，因为它以**不可通约的方式持存**。

正是这种奠定交流基础的回路被短路所取代——通过一个除了可通约性外别无他物的市场（例如，没有技艺之道的劳动力，形成一种缺乏生活智慧的购买力）——这是一个**愚人市场**（dupes）。因为归根结底，这个市场根本算不上市场。正如苏格拉底早已针对高尔吉亚所指出的那样，事实正是如此。

然而，**药理学经济**是一种不会导致毒药与解药二元对立之实体化的治疗方式：**药理学经济**是诸种倾向的**合成**，而非**对立双方**的辩证斗争^①。这种合成的具体表现在于对一般器官学三个层次的配置——如此一来，它们构成了一个**关怀系统**（system of care）：药理学层面的个体化（技术个体化）通过转导性强化（transductively intensifies）推动另外两个层次的个体化（心理个体化与集体个体化）。

另一方面，**药理性的经济失调**（dis-economy of pharmaka）^②源于任何**新药学**

^① Méaéance et discrédit 1, p. 76 and p. 88.

^② 人们使用“不经济”（diseconomy）这一概念，是为了描述由负外部性引发的破坏性动态——即由环境失调导致的后果：这些失调的成本不由经济主体承担，但却会削弱整体经济的稳定性。

物的出现——当它导致另外两个层次发生**短路**时即会产生这种失调：如今的“社交网络”技术^①便是如此，没有任何公共权威为其制定政治经济学框架或关怀系统；或者，当视听媒介对过渡性客体造成短路时，在婴儿大脑器官的突触生成过程中也会发生这种失调——婴儿的心理装置由此被**无产阶级化**^②。

^① 这些基于 Web 2.0 的社交网络由社会工程和所谓社交网络的发展所催生，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 Facebook——其用户数在 2008 年 8 月突破了 1.6 亿。然而，这些数字“关系技术”还具有诸多其他维度。由 Cap Distal、工业设计高等学院（École supérieure de création industrielle）与蓬皮杜中心创新研究学院（Institut de recherche d'innovation du Centre Pompidou）共同组织的“新工业世界对话”系列第二场，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相关内容即将由千一夜出版社（Mille et une nuits）出版。

^② 多项研究强调了这一点，其中一项特别针对电视和 DVD 对三岁以下儿童的影响——该研究由华盛顿大学的弗雷德里克·齐默尔曼（Frederic Zimmerman）和迪米特里·克里斯塔基斯（Dimitri Christakis）牵头。相关内容可参见 Stiegler, *Taking Care of Youth and the Generations*, trans. Stephen Bark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6.

论工作

神经系统的无产阶级化、系统性愚蠢与新商业

生产者的位置缩得越小，市场和消费者的数量就必须扩得越大——自动化不断扩大无产阶级化的领域，同时削弱劳动的作用（即削弱可变资本的作用）。交易本身已被自动化，工程师自身也被无产阶级化了。曾经构思、开发、安装和管理系统的工程师已不复存在。如今存在的是“流程”，在这些流程中，越来越多的**助忆工具**介入其中，在每个层面上对心理个体进行短路。

在这些流程中，神经系统的劳动力正日益被无产阶级化，而**神经系统的无产者**在知识剥夺上并不亚于**肌肉系统的无产者**。然而，他们被剥夺的知识并非**技艺之道**（*savoir-faire*），而是理论知识——即本质上属于理智性（*noetic*）的知识。随之发展出一种精神权力（*psychopower*），它既控制消费者（在此意义上，这涉及对力比多的引导），也控制生产者与**设计者**——后者的神经能量必须被纳入西蒙东（Simondon）所称的“技术集合体”（*technical ensembles*）的服务体系。

于是我们看到，**纯粹的认知劳动力完全沦为缺乏知识的存在**——借助认知技术，认知本身已被无产阶级化^①。这便是所谓的认知资本主义（亦称为“创造性”或“非物质”资本主义）的本质。其具体表现为：**认知被降格为可计算性**——从药理学和经济学角度看，逻各斯（*logos*）已沦为了理性（*ratio*）^②。

如果说熟练职业（*métiers*）确实仍有留存，那么其中极少与所谓的“创造性”生产相关联，而且大多数时候这类工作并不真正具有创造性。因为所谓“创造性”——即**劳作**（*ouvrer*，意为“针对某物劳作，开启一项作品”）——在于生产负熵。然而今日被称作“创意工作者”的人，实则仅仅是制造那种**可以在市场上被估价的“价值”**：他们如同新闻官或公关人员，致力于让系统适应**熵增**状态，却并未

^①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深刻揭示了，对“**知识时间**”的消除如何构成新自由主义本质所蕴含的“不平等治理”计划的核心——而恰恰在这一时期，一种意识形态大量涌现，试图让我们相信：正是导致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所称的“认知者”（*sachant*）陷入无产阶级化的**认知资本主义**，竟能被包装成“知识社会”。参见 Lazzarato, 《不平等的治理》（*Le Gouvernement des inégalités, Critique de l'insécurité néolibérale* (Paris: Amsterdam, 2008)）。

^② *Mécréance et discredit I*, p. 120.

创造任何作品或开启任何事业（mais qu'ils n'ouvrent à rien ni tout）。真正的“劳作”（oeuvrer）始终意味着与不可计算之物打交道——即与欲望的无限性共处，这意味着一个个体化进程正是通过其未完成性而得以构成。

这便是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所称的“大脑间的合作”^①的现实——这种合作通过符码化系统（grammatization systems）生成，正是这类系统使所有神经系统高级活动任务的无产阶级化成为可能。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系统性愚蠢（systemic stupidity），这不仅解释了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为何能在众议院面前真诚地为自己将世界推向灾难边缘的行为辩护，也解释了那些“金融精英”为何会因发现自己被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欺骗而陷入愚蠢化（cretinization）：这些精英自身已被无产阶级化——即被自己的逻辑剥夺了对自身逻辑的认知，而这种逻辑已退化成为一种无余数的计算，最终导向了一个愚人市场（market of fools）。

然而，像扬·穆利耶-布唐（Yann Moulier-Boutang）或毛里齐奥·拉扎拉托这样的研究者，为何且如何能在这种“大脑资本主义”或“认知资本主义”^②中察觉到一种通向某种替代方案的新质要素？我的论点（即便他们未必认同）是：在此处——即所谓的“网状资本主义”（资本通过“药理学物”构成协作性与对话性的环境）中，一种真正的文码化突变（mutation de la grammatisation）已然发生：数字网状化（使认知活动自身被无产阶级化的进程）构成了一种断裂，通过这一断

^①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的《创新的力量：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经济心理学反对政治经济学》（*Puissance de l'innovation. La psychologie économique de Gabriel Tarde contre l'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Les Empêcheurs de tourner en rond, 2002）及《不平等的治理》即为例证。在2002年的分析中，拉扎拉托援引加布里埃尔·德·塔尔德（Gabriel de Tarde），却显著忽略了助忆工具（hypomnesis）问题——没有这一维度，所谓“大脑间的合作”便无从谈起；与助忆工具相关联，他也忽视了使这种合作控制成为可能的持存系统（retentional systems），以及大脑活动本身在生产与消费两端的无产阶级化进程。另一方面，2008年的著作中，他描述了这种无产阶级化的效应及“不平等治理”体系，但其视角已非“大脑间的合作”，而是神经系统为获取（并非“劳作”，而仅仅是）“就业”机会的竞争。

^② 扬·穆利耶-布唐（Yann Moulier-Boutang）援引拉扎拉托，在《认知资本主义：一种新的重大转型》（*Le Capitalisme cognitif. Une nouvelle grande transformation*, Paris: Amsterdam, 2007）中阐述了他的论点。

裂，**关联环境**（associated milieus）得以形成——即与“无产阶级化”所蕴含的“解离”（dissociation）和“去个体化”（disindividuation）进程相抗衡的**个体化环境**（milieux d'individuation）。

正是在这种网状环境中，佩卡·希马宁（Pekka Himanen）所称的“黑客伦理”^①得以浮现，并可能为新的斗争开辟场域：一场将黑客阶层与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所称的“向量主义者”^②相对立的**抽象斗争**。希马宁（从新韦伯主义视角）与沃克（从后马克思主义和情境主义视角）均表明：使神经系统无产阶级化成为可能的数字**药理学物**，同时也为一种新的心理与集体个体化进程创造了条件——借此，一种通向空前政治经济前景（即贡献式经济）的跨个体化新进程获得了可能性。

如果说，在网状资本主义时代，认知技术与数字化文化技术形成于特定的文码化进程，而该进程所催生的**药理学物**通过对跨个体化的短路导致了解离，那么，**关联社会技术环境**的形成，正是对这种文码化“毒化”趋势的替代方案。然而，这一替代方案的前提是对主导工业模式的真正革命——它或许未必能达到**推翻**资本主义的程度，但必然是一场资本主义自身的**革命**。

关联与解离的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学中所谓“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形成问题。当扬·穆利耶-布唐（Yann Moulier-Boutang）采用“授粉”^③（pollination）这一隐喻时，他所描述的现象与数字网状化的形成相关联，构成了**文码化进程**中的一种突变，并催生了一种**积极的药理学外部性**（pharmacological externality）：即一个**关联社会技术环境**（associated sociotechnical milieu），其中展开的斗争旨在对抗解离性环境（即无产阶级化环境）扩散所带来的后果——后者恰恰相反，会催生负外部性与药理学物毒性^④的蔓延，亦即一种广义的环境破坏，其影响不仅涉及自然与地球物理环境，同样也包括心理与社会环境。

这种关联社会技术环境使针对“向量主义者”所引发的环境破坏的斗争得以展开，并开辟了一个工业与商业关系的新场域——它消除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对

^① Himanen, *The Hacker Ethic*.

^② Wark, *A Hacker Manifesto*.

^③ Moulier-Boutang, *Le Capitalisme cognitif*, pp. 199ff

^④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 Faure, Giffard and Stiegler, *Pour en finir avec la mégroissance*.

立，而这恰恰打破了市场对商业的破坏：它构成了一种**新商业**，即一种新的心理与集体个体化制度，生产出长程跨个体化回路——贡献者正是为这种长程回路的创造贡献力量的人。

然而，这种环境仍可能催生解离逻辑——正因如此，必须以抽象药理学物为工具展开对话性的^①、因而具有治疗性的斗争，这本质上意味着对这种新商业的呵护。

在数字网状化进程中形成的关联环境，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正外部性：它源于最新阶段的文码化（认知与符号层面的文码化），是技术-工业领域的正外部性——即恢复**理性**的认知维度，因为它构成了一个对话性关系空间，在此空间中，**心理生成**（psychopoiesis）得以转变为**认知政治**（noopolitics），或使**药理学物**能够服务于贡献式经济——即一种社会心理治疗体系——因为“经济化”（economize）首先意味着在家庭和政治层面进行呵护^②。

闲暇与正外部性：间歇性

在关联社会技术环境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功能性对立已过时，外部性必须从经济层面进行**培育**和增值——尽管如同价值一样，它们无法简化为市场经济指标的可计算性：这需要一种经济价值及其**衡量**的新观念，使其不被简化为单纯的**计算**。这种文化既是力比多经济（libidinal economy）也是商业经济，它需要新的互助机制、新的治理权力形式，以及新的公共财产对象。

在这方面，毛里齐奥·拉扎拉托的两部作品——其中他分析了间歇性演艺工作者（intermittents du spectacle）为维持其身份地位（2003年6月，法国政府在雇主压力下曾对这一身份提出质疑）而进行的斗争的核心议题——其重要性超越了艺术职业领域。在与“间歇性与临时工作者协调会”（Coordination des Intermittents et Précaires）合作开展的一项调查发表后，安东内拉·科尔萨尼

^① 这一对话主义并非辩证法意义上的对话主义，而是更接近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参见《电视统治反对民主》（*La Télécratie contre la démocratie*）与《重新使世界充满魅力》（*Réenchâter le monde*）。

^② “经济化意味着呵护”（“*Économiser signifie prendre soin*”）是我2008年春在国际哲学学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举办的一场研讨会的主题，该研讨会是工业之艺（Ars Industrialis）理论活动的一部分，音频记录可在 www.arsindustrialis.org 获取。

（Antonella Corsani）和毛里齐奥·拉扎拉托指出：

…… 反对失业福利模式改革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场围绕时间使用展开的核心较量。针对“增加就业时长”的要求（这正是雇主质疑间歇性工作者身份地位的动机所在，即个人生命中被工作占据的时间），间歇性工作经验提出了多元就业时间的对抗性主张。^①

换言之，工作时间的的问题不能简化为就业时间的问题，并且

…… 严肃谈论增加或减少工作时间，意味着要考量所有这些多元时间性的整体。^②

法国将每周工作时间缩减至 35 小时的法律完全忽视了这一问题。正如里夫金（Rifkin）早在 2006 年便强调的^③，该法律的一个结果是人们用于消费的时间增加了——但以其他方式（即就业时间范畴之外的方式）投入工作的时间却并未增加。这些超出就业时间的付出，属于罗马人所珍视的 **otium**（**闲暇**）范畴——让-马里·安德烈（Jean-Marie André）在分析西庇阿时代这一概念时，将其译为“**治学性闲暇**”（**studious leisure**）^④。

源于罗马文化且最初与军事语境相关的“闲暇”（**otium**），后来成为人类活动时间之高贵面向的象征——在《怀疑与失信》（*Mécréance et discredit*）中，我曾试图表明这是**认知间歇性**（**noetic intermittence**）的时间^⑤——它构成了“非闲暇”（**neg-otium**，即就业时间）的可能性条件。灵魂之所以只能在间歇性的时段中**真正**成为“认知性的”（并因此本质上被建构为一种“仅在间歇中存在的存在”），是因为它在大多数时候反而表现得像一个感性的、甚至植物性的灵魂。正因如此“间歇性工作者”（戏剧、电影和电视行业的临时工作者）始终在两个状态间摇

^① Corsani and Lazzarato, *Intermittents et précaires*, p. 121.

^② Corsani and Lazzarato, *Intermittents et précaires*, p. 121.

^③ Rifkin, *The End of Work*, “Introduction.”

^④ Jean-Marie André, *L'otium dans la vie morale et intellectuelle romaine des origines à l'époque augustéenne*, (Paris: PUF, 1965), p. 177.

^⑤ 在《怀疑与失信》中，我认为认知灵魂只能间歇性地进入认知行为，并因此作为“仅在间歇中存在的存在”而存续。

摆：一方面是对其认知知识的可计算性使用（这种知识随后被付酬，即被“交易”[*négocié*]），另一方面是这种知识的真正发展。而对“间歇性”（即“间歇性工作者”）的摧毁，正是要消灭这种“认知性”并使其无产阶级化（即工具化），以便让文化产业获利。

进入认知行为的时间即**闲暇**（*otium*）的时间——它绝非空闲时间，而是指休闲时间，即自由与“自我关怀”（*care of the self*）的时间。从一种嵌入“普遍经济”（按乔治·巴塔耶对该术语的阐释）的经济学视角来看，**闲暇**是一个与记忆术装置（*hypomnemata*）特定发展相关联的时代——即福柯所揭示的，支撑自我技术的文码化时代；而对于一种嵌入力比多经济（并为后者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学而言，闲暇构成了一种**外部性**，它打开了人类交往的空间，因为它是一个**心理与集体个体化的过程**，在其中形成了跨个体化的长链回路。另一方面，非闲暇（*neg-otium*）则构成了一种可通过“账目”（其可能性本身源于记忆术装置）被**内部化**的经济——对商人而言，这种经济中的一切皆可计算，在市场上可交易，而所有“度量”（*la mesure*，即尺度、节制或节奏；希腊语中为 *metron*，亦指“界限”与“节奏”）的意义都被简化为这种计算。

科尔萨尼与拉扎拉托所描述的“就业时间”（即被雇主内部化的劳动时间）与“工作时间”（作为自我技术的时间）的结合，实则构成了事务性工作（*negotium*，即“非闲暇”）与闲暇（*otium*）的经济——只要它们能被理解为西蒙东（Simondon）所谓转导关系的术语，根据这一关系，这些术语通过其**个体化张力**而被建构。

我们观察间歇性工作者利用时间的方式，迫使我们摒弃就业与失业、活跃与不活跃的二元逻辑，并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工作”这一范畴本身。如果活动不仅发生在所谓的失业期，亦或贯穿于所谓的一生之中——在所谓的闲暇时间、参加培训与教育的时间，乃至最终成为休息的时间里——那么“工作”概念所掩盖的是什么？因为在这一概念下，实则存在着多种活动与异质的时间性。^①

这些分析表明，仅以 20 世纪 90 年代流行的术语来提出工作问题是不够的——当时长期失业的现实迫使人们反思生产力提高带来的结构性后果。超越这些

^① Corsaiii and Lazzarato, *Intermittents et précaires*, p. 122.

框架，问题的核心在于工业模式的变革，而这一变革也将催生对工作的全新理解：这种“工作”绝不能与“就业”混为一谈。随着消费主义模式的瓦解，它需要发明一种新的社会时间性，正如拉扎拉托所揭示的，这种变革还将重新定义罗伯特·卡斯泰尔（Robert Castel）所称的“社会财产”问题^①。

这便以全新的术语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杰里米·里夫金率先提出、后由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②跟进的负所得税构想，其目的是支持“社会部门”的发展：这一部门因其非市场性而被界定为非经济性的。然而，**这绝非提出一种将经济置于终结的问题**，而是要构想一种**另类经济**，并超越消费主义——在消费主义框架下，就业所产生的购买力，实则在生产者与消费者普遍无产阶级化的时代，摧毁了“工作”及一切形式的知识。

里夫金提议的缺陷在于，他对经济循环的考量并未涵盖**闲暇**或一切形式的知识问题。另一方面，将负所得税作为对正外部性发展的共同支持，并通过构建一种新的社会财产形式，这一理念在为表演艺术领域间歇性工作者提供失业救济金的做法中，找到了一个特别适配当前变革的模式——科尔萨尼与拉扎拉托的著作已明确揭示了这一点。但此类提议绝不能仅限于艺术、文化和“创意工作者”的领域：需要重新思考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经济工业模式。

去团结化与负外部性

重建正外部性并支持源于**闲暇**（即认知间歇性）的工作实践，是重构长程跨个体化回路的必要条件，而这本身也是抵御负外部性扩散的唯一可能。随着消费主义的瓦解以及环境失衡成为全球性议题，世界正逐渐认识到负外部性扩散的程度。在这种失衡的表现中，必须包括短期主义独裁（由市场营销施加于每个社会）对公共领域（政治空间与时间）和私人领域的破坏性影响——这种影响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彻底瓦解**。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例如在比利时，弗拉芒人将所有不会说荷兰语的人排除在公共住房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跨个体化过程中的短路如何摧毁了“参照

^① Lazzarato, *Le Gouvernement des inégalités*, p.43.

^② Michel Rocard, “Preface” to Rifkin, *La Fin du travail*.

的个体化”（the individuation of reference）^①，而这种个体化本可使两种语言层面的社会心理个体化进程，能够指向同一政治与领土个体化进程，从而在同一个民族内凝聚。这种分离与短路的破坏性影响——与关联环境中发生的情况相反——在弗拉芒人与瓦隆人的政治-语言对立中清晰可见。

全球文化产业并未促成参照的个体化，反而以市场营销的行为规范取而代之，而后者正不断瓦解社会团结：

- 首先，在当代领土空间中：弗拉芒人撤回了对比利时瓦隆人的团结，导致其政治空间遭到破坏；

- 其次，在当代的代际时间维度中：对某一世代注意力的“捕获”（captatio）将其与其他世代隔绝，在代际跨个体化进程中造成短路——例如，原始认同未能在青少年心理装置中形成，或成年消费者尽管无力承担子女教育费用，却仍想方设法购买昂贵汽车。

正是这种去团结化进程，构成了当下市场价值衰退的深层原因——当资本主义沦为欲望驱动（pulsionnel）且投机成性的体系，其不可避免的崩塌已致使市场资本化走向崩溃。这一进程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之一，便是青年的贫困化：在本可遏制代际冲突的跨个体化进程中，代际象征性纽带已被“短路”，恰在此时，它释放了代际经济对抗的威胁。

这一切导致了普遍的不负责任，以至于分离的环境的扩散必然与负外部性的扩散相关联。作为将心理个体与其集体个体化关系割裂的因素——相应地，也作为摧毁所有形式投资的因素（金融投机与欲望驱动的执念取代了这些投资）——分离的环境在社会的每个领域催生了有毒行为，而这些领域被结构性短期主义所主导，正是因为内驱力和投机本质上都是短期的。

责任消解、去升华与极端祛魅所引发的短期化倾向，是利润率趋降最直接的后果——加之力比多能量的趋降，以及勒内·帕塞（René Passet）所称的“极限过渡”（即系统运行过程导致其自身运行条件被破坏的过程）的扩散，这种倾向必

^① 关于这些概念，参见 *La Télécratie contre la démocratie*。（就这一概念而言，暂时将其译为“参照的个体化”，斯蒂格勒用此概念指代技术系统通过外部符号网络持续参照并重构个体身份的过程，强调数字时代个体化与社会技术环境的不可分割性——译注）

然转化为负外部性的失控式增长。

被黑手党扫除的资产阶级

共产主义的历史失败源于其未能思考“联合”——即放弃了反对作为知识丧失的无产阶级化的斗争，也放弃了反对跨个体化短路的斗争（这类短路既是斯大林主义官僚极权主义的典型特征，亦是市场营销所促成的总体化的典型特征）：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仅仅是在“分离方式”上区分了彼此。即便那些置身于斯大林主义之外、反对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始终未能进行“分离的批判”，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混淆了无产阶级化与贫困化。

在共产主义世界中，这种分离在本质上和结构上导致了对存在结构的极权主义否定——而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当它将福特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相结合时^①。与共产主义不同，资本主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促成了基于这些存在结构的动机系统的建构——尽管它最终利用、剥削并摧毁了这些结构，但其手段确实有效，甚至构成了一种新的力比多经济与升华前景，这与共产主义的分离形成反差^②。然而，资本主义最终仍会成为一种必然导致动机消解的分离过程^③：它注定会在自身引发的力比多能量趋降趋势中遭遇极限。

此时有必要回到商业问题。政治经济学不仅在符号交换层面，也在商品交换层面组织着跨个体化进程。有一次在北京，我乘坐的出租车驶过一家售卖塑料人体模型的商店，令我惊讶的是，在这个据称是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中，一位中国店主竟能开创这样的生意——该体制之所以能如此强有力地运转，仅仅是因为在

^① 这两种经济与历史现实截然不同——尽管拉扎托常将它们混为一谈（尤其参见 *Le Gouvernement des inégalités*, 第 42 至 47 页），正如当今许多人所做的那样。福特主义与“调控”或“再分配”毫无关联，也从未提出过“社会财产”：它通过功能性地整合生产与消费，从而发明了消费主义。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代表着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一种妥协。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这两种变革能够相互结合，这一点显而易见，但由此并不能推出它们应当被混为一谈：相反，必须对其加以区分，才能理解它们如何结合，以及最终如何瓦解。

^② 苏联心理学，更广泛地说，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精神分析之认识论范围的否认，本质上与这一问题相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68 年 4 月《新批判》（*La Nouvelle Critique*）的一位读者向编辑提问：“《新批判》能否组织一场马克思主义者与精神分析学家的辩论？[.....] 年轻的共产主义精神病医生无法理解他们苏联同行的立场——后者完全谴责精神病学的这一重要面向。目前缺乏对这一状况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新批判》第 13 期）。

^③ 我在 *Constituer l'Europe 2 et Le motif européen* (Paris: Galilée, 2005), pp. 29ff 分析了这种动机消解。

其内部，心理个体化被一种**无中介**的集体个体化所控制，即去心理化的、使跨个体化短路的，从而导致去个体化、正在去个体化并摧毁所有动机的体制。

严格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已**不再**运转，因为它要求心理个体成为自我导向的“自身创业者”^①——这种个体化不是通过集体个体化，而是通过市场营销所主导的集体去个体化实现的：后者利用引发短路所带来的控制可能性，并自“保守革命”与新自由主义（以及相当于法国版新自由主义的“法国雇主协会重建”计划）以来，通过破坏社会的不平等治理——所有这一切都在摧毁经济环境本身，使其沦为一种“非经济状态”，最终导致中介作用的消解（而中介作用正是跨个体化在经济领域及其商业形式中的体现，更何况“竞争”实际上只会助长垄断的膨胀）。

去升华——在同一过程中导致负外部性的扩散、市场对商业的消解以及社会联结的破坏——可表现为如下事实：资产阶级被黑手党扫除，这既是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命运，也是所有欲望驱动的资本主义的命运。

当世界的祛魅完成时，黑手党往往会取代资产阶级，而资本主义也会呈现出本质上的黑手党式特征。此时，这种祛魅不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不再可能有任何相对的“复魅”**（例如，现代艺术的出现便是资产阶级现代性内部及其自身的一种复魅：福楼拜通过雅克·阿尔努这一人物所批判的“工业艺术”，正是现代艺术所拒斥的对象）^②。当祛魅变为绝对，强权的运作便**失去了连贯性**，与任何形式的**闲暇**断绝关联，不再有丝毫信仰，最终沦为绝对的**犬儒主义**——既无信仰，也无律法。

正是在这个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时代——即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时代——人们目睹了系统性国家谎言、欲望驱动的政治，以及工业民粹主义催生的成瘾性消费主义的滋长。如果说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一种病症，其出现是预示绝对祛魅的警示信号，那么资本主义的黑手党化并非偶然或某种次要的附带现象；相反，它是这种资本主义正常且日常的运作形态。在这一意义上，萨科齐主义——不幸的是，若能如此表述的话——绝非贝当主义的回潮：它远比老调重弹更为严重、复杂，也更难以被理论化。

^① 拉扎拉托的分析在此处尤为清晰，尤其参见其 *Le Gouvernement des inégalités*, pp.30-31.

^② Gustave Flaubert, *L'Éducation sentimentale*.

中产阶级即将消失，因为消费主义的发展已将他们无产阶级化。这并非指他们陷入了贫困——前者并非后者结果。而是说，中产阶级不再属于任何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因为他们变得贫穷，而是由于一种**象征的贫困**（symbolic impoverishment），以及**审美与认知层面的无产阶级化**：失去了**闲暇**，例如无法获得罗兰·巴尔特曾深以为乐的那种工具性实践——正如他在《实践音乐》^①中所阐释的，对舒曼音乐的真正欣赏只能源于对其的演绎，即坐在钢琴前弹奏的实践；这种情感也隐含在皮埃尔·舍费尔的父亲常对他重复的那句话背后：

练习你的乐器！

这样一来，舍费尔的父亲便提醒我们：**闲暇**即工作，工作总是涉及工具（乐器），因此**闲暇**亦复如此。

小资产阶级尽管并不富裕，但仍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因为他们能够获得维持生计之外的东西，能够从单纯再生产劳动力的必然需求中解放出来，进而从纯粹**的事务性工作**（即完全可计算的交换）中解脱出来：小资产阶级有能力成为音乐爱好者。曾经属于贵族的特权，在 19 世纪成为资产阶级的**典型**特权，随后也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特权。

这正是消费主义向所有社会阶层扩张所消解的东西。正如我与尼古拉·多南（Nicolas Donin）所描述的，通过一种“感性的机械转向”^②——这种由心理权力的心理技术所构成的**药理学**时代的可能性条件^③——消费主义将一切转化为需求，即生存必需，并消解了欲望，即属于**闲暇**与升华的对象，甚至包括资产阶级的最高阶层——他们因此沦为黑手党式存在。而对于让-克洛德·米尔纳（Jean-Claude Milner）所称的“理想中的工薪阶层”（les salaires de l'idéal）^④——比如大学教授——他们也无法逃脱这场狂欢。

^① Roland Barthes, “Musica Practica”, in *Image, Music, Text* (London: Fontana, 1977), p. 149.

^② 参见 *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2. La catastrophe du sensible* (Paris: Galilée, 2005), p. 26.

^③ 参见 *Taking Care of Youth and the Generations*.

^④ Jean-Claude Milner, *Le Salaire de l'idéal: La théorie des classes et de la culture au XXe siècle* (Paris : Le Seuil, 1997).

如今，在联合环境中重新构建的贡献的力比多经济与政治经济，趋向于重新开启这一维度——即“连贯性”的维度，以及我所称的“人民的闲暇”（otium of the people）^①的维度。唯有闲暇能够重建信用，即一种经济：除非被投射到投资之中，否则便不存在经济。这为当代持存系统重新开启了**前摄性**（protention）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在力比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这始终都是一种前摄性经济。

前摄经济、永久革命与贡献

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系统，尤其是资本主义系统，始终构成着**前摄生产系统**。随着一种极为特殊的**文码化**案例——货币——的出现，这种前摄生产系统显然实现了更高的效率：在拉丁语中，“货币”（money）一词令人联想到记忆女神**谟涅摩叙涅**（Mnemosunè）^②。尽管如此，前摄性问题无法被简化为信用货币问题：它植根于一个**持存集合**，而这一集合既由机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心灵所构成，也由货币所构成——货币如同所有持存形式一样，将时间转化为空间，但其转化方式显然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若资本主义是一个在执行效能上极为显著的前摄生产系统——因此，当人们称股市在某某危机中蒸发了数千亿美元时，这意味着**信用体系**失去了一种**主动前摄力**，即前摄（预期）作用的力量^③——那么贡献式经济便是文码化持存与投资前摄之间一种新的经济架构（力比多与政治层面的）。

资本主义创造前摄的系统是一种信用体系，它通过将信仰转化为可计算之物、并由此催生比信仰更“优”的东西（至少在**事务性**思维眼中如此：即信任[*confiance*]），从而引发了信念系统的变革。广义上的信用——无论其形式是银行金融、宗教、科学、文学、艺术、政治抑或社会层面的——本质上都是前摄的组

^① *Mécréance et discrédit I.*

^② 倘若货币是文码化与第三持存的一种形式，那么一个核心问题便在于衡量其持存物质性变化所引发的后果。例如，当吕底亚人最初引入的金属硬币最终被约翰·劳（John Law）的纸币取代，而纸币又继而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指券**（assignats）所取代时。这正是让-米歇尔·雷（Jean-Michel Rey）在《信用时代》（*Le Temps du credit*,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2002）中探讨的重要议题之一。

^③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 trans. Geoffrey Bennington and Rachel Bowlby (Cambridge: Polity, 1991).

组织化形态。信用是前摄的具体社会表达：这些前摄通过**自我实现**、通过“践行”（借用奥斯汀的述行理论来阐释信用效能问题——正是这种效能推动了物质、社会关系、行为模式（即**意志**）的转变）而得以落实，并由此催生了一场非凡的“永久革命”——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正由这种革命所构成^①。

19 世纪至 20 世纪期间发生的，是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反前摄化”组织进程——这一进程首先体现为合法性权力的祛魅与信仰的世俗化：这并非对信仰的摧毁，而是将其转化为可计算的信仰，包括通过生产装置对科学信仰的利用，以设计改造物质、自然、技术、人类及行为的方式。这种信仰的转化在整个 19 世纪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使资产阶级得以通过发展学校体系、推动对民族历史的参与等社会工程，构建新的社会成员身份认同与凝聚力形式。

在 20 世纪，力比多能量的动员是通过引导注意力来捕捉和利用前摄实现的。这本质上是在**构建一种工业前摄**——使消费者前摄中积累的张力指向工业产品（这些产品是生产者前摄的“实现”），其目标在于让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前摄趋同，从而克服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矛盾。

在最近的危机过程中，这一前摄系统因被推向愈发极端的短期主义而失控，最终抵达**自我毁灭**的极限（一种短期倾向若被推向极致，便会导致知识所依存的持存时间的毁灭，以及投资所依存的前摄时间的毁灭）。前摄的崩塌正是消费主义资本主义的宿命，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形式依赖于持存的无产阶级化——即对注意力的控制沦为无产阶级化状态，而这种无产阶级化既意味着知识的丧失，也同样影响着生产与消费领域的丧失。

演艺界的非固定从业者，以及所有被让-克洛德·米尔纳称为“理想的挣薪者”的人，始终在培育一种与**药理学**的关联——以便能够进入智性活动之中，并从中获得一种独特的愉悦。这种愉悦不能被视为单纯的享乐，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无限差异**的感觉”。

然而，在联合社会技术环境网络中发展出的新工作实践，其自身也趋向于通向智性活动——从根本上说，这一目标正是其动机所在。这种动机本身即构成一种前摄。而这一事实状态仅有待一事：使其成为一种法律状态，从而让持存系统

^① 在此，对利奥塔《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的一种新解读或将有所助益。

能够服务于这种前摄性活动。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致力于这样的法律问题——鉴于这些日益普及的实践已远超出“文化领域”或“社会部门”，正从整体上重构经济场域。

基于对第三持存在经济中地位的分析，重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引发的正是这样的问题：这些属于**药理学**的问题，而贡献式经济构成了当代文码化阶段特有的**社会疗法**——换言之，它构成了其关怀体系。

资本的药理学与贡献式经济

献给让-米歇尔·萨朗斯基 (Jean-Michel Salanskis)

纪念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Jean-François Lyotard)

作家与艺术家的至高努力，仅能成功为我们部分揭开丑陋与无足轻重的面纱——正是这层面纱让我们在世界面前漠不关心 (*incurieux*)。然后，他对我们说：

看啊，看

散发着三叶草与艾蒿的芬芳

紧紧簇拥着湍急狭窄的溪流

那是埃纳与瓦兹的土地。

——马塞尔·普鲁斯特

2007 年 1 月 25 日，在一场围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作品展开的学术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对《后现代状况》的一种解读。该解读将利奥塔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特征界定为一种新型力比多经济的典型特征——这种经济形式由 20 世纪初北美消费主义资本主义所创造。

根据这一解读，后现代性源于力比多的消费主义组织化，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力比多本身的消解，使其陷入“去经济化状态”——即现代性迄今所构成的那种力比多经济的消解。这一消解进程的后果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后现代状况》出版之际正值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掌权，标志着“保守主义革命”的开端）。

在我的解读过程中，我试图表明：为何那些使我们能够思考这种作为后现代性的**消费主义力比多去经济化状态**的概念，与其说来自利奥塔的同名著作^①，不如说来自弗洛伊德——因此，这涉及对弗洛伊德的重新阅读与重新诠释。我试图表明，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开启了一种对资本主义（以及普遍伴随资本主

^① Jean-François Lyotard, *Libidinal Econom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义的无产阶级化扩张)进行新思考的可能性;这种思考仍有待展开,但展开的前提是对利奥塔关于“力比多经济”的论述进行批判。

在这次发言后的讨论环节中,与科里娜·埃诺多(Corine Énaudeau)共同组织这场研讨会的让-米歇尔·萨朗斯基(Jean-Michel Salanskis)对我说,他已不再理解谈论“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也不理解那些继续使用这个词的论述;他随即表示,无法理解我本人的论述。

本书如同《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样,试图回应友人在2008年10月资本主义危机暴露其灾难程度前不久向我提出的质疑——当时他表示已无法理解“资本主义”一词的意涵,亦无法理解任何继续使用该术语的论述。此处提出的论点,最初在“工业之艺”(Ars Industrialis)管理委员会面前阐述^①,后又于2009年12月5日该协会的公开会议上宣讲^②,延续了《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开启的分析。

这部著作考察了两个问题:

- 在“趋向下降”这一短语中,应当如何理解“利润”一词?
- 更普遍地说,这个短语所表达的概念中,有哪些要素在起作用?

没有反趋势(counter-tendency),就不存在趋势

《资本论》第三卷试图用“利润率趋于下降”这一短语探讨的问题——其核心要义显然无法通过公式 $p = s/(c+v)$ 来衡量——是马克思提出的一种否定性动力。马克思认为,这种动力在原则上是内在于一个在矛盾趋势中形成并维系的资本主义系统的:因此,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受限于某种临界值的动态系统,一旦利润率运行本身所产生的下行趋势得以“完成”(s'accomplissait),就会触及这一临界值。

这显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对这一理论的诠释方式:相反,马克思主义在这一

^① 工业之艺(Ars Industrialis),一个致力于精神技术之工业政治的国际协会:

<http://www.arsindustrialis.org>

^② 本次会议可通过以下链接访问: <http://www.arsindustrialis.org/pour-une-économie-de-la-contribution-1>

点上宣称的是这一趋势**不可避免的**会实现，而马克思本人很可能也如此理解。但正如我们从尼采和弗洛伊德那里所学到的，如果存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那么必然也存在一种反趋势。若非如此，我们所谈论的就不再是一种“趋势”，而是一种简单而线性的，即决定论的意义上的演变了。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本人（以及在他之前的黑格尔辩证法）未能以这种方式——从趋势的角度——进行推理，这是马克思遗留的一个问题，但这并未否定他关于利润率下行趋势的理论。

这种从趋势角度展开的思考涉及**心理学**，即通过一种关于精神、关于其逻辑和经济的论述：就其作为一种经济而言的逻辑。

鉴于有必要就利润率的趋于下降展开讨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种趋势是否存在，而在于其反趋势（或诸多反趋势）的性质。真正的核心在于：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思考各种趋势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所指的利润是投资回报率

关于“利润”（profit）一词应如何理解，问题在于：如果“利润”可以被定义为投资回报率，即一个使投入资本获得回报——进而使所承担的风险获得补偿——的系统功能，那么，这一利润的定义是否应当包含投机？鉴于在**此处，核心问题是时间**，更确切地说，是影响短期与长期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对抗**的因素，而投机往往趋于摧毁投资系统。

金融化经济中产生的利润显然不同于马克思所称的利润率（ p ），其中 $p = s/(c+v)$ 。利润率 P 依赖于作为不变资本（ c ）与可变资本（ v ）的生产系统。相反，金融化产生的利润往往与基于 $s/(c+v)$ 的利润率 p 相脱节，并本质上成为投机性利润。因此，它们引出了马克思所称的“虚拟资本”问题。

利润、持续性与毒性

针对趋向下降理论的一个常见反驳是：过去几十年间，资本积累了巨额收益。但 2008 年危机（如同此前的危机，但比任何早期危机更甚）迫使我们必须审视这种盈利能力的性质与稳固性——在这场危机中，这种盈利能力已然显得具有**结构性毒性**。

利润问题首先是，并且一并涉及到：

- 其外部可持续性问题的，即对于社会其他部分而言（如果利润摧毁了社会，就无法持久）；
- 其内生耐久性问题，即对于资本自身而言（资本必须随时间推移保持其价值）；
- 它所构建的时间性问题，即关于虚拟资本，鉴于虚拟资本作为一种**相对可计算的前摄系统**^①，是该系统的必要功能，且在这一点上不能简化为单纯的投机，因此其核心在于构成虚拟资本的预期质量问题，而企业投资则构成了另一种类型的预期。

只有在这样的预期系统之内——且该系统必须由规则来规范和巩固——利润才能产生。

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所实现的、据估算达 500 亿美元的收益，以及被他蒙骗的投机者所获得的收益，究竟能否算作利润？毫无疑问，它们曾被当作利润实现。但这些利润具有欺诈性、不持久性，且**纯粹**是有毒的，因为它们是通过伪造的预期创造出来的。而对麦道夫的客户而言，这些收益已化为血本无归的损失。

1976 年，既是罪犯又是极右翼活动分子的阿尔贝·斯帕贾里（Albert Spaggiari）抢劫了尼斯的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完成了所谓的“世纪大劫案”，并从中获得了 5000 万法郎的“利润”。但这些“利润”从未被法律认可为真正的利润：相反，它们被定性为盗窃。

那些对资本药理学掉以轻心的人

我们是否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虚拟资本即便不是欺诈性的（即**纯粹**有毒的），也始终倾向于生成有毒的系统？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虚拟资本**比任何其他人类心理技术更像是一种药剂**（pharmakon）^②——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账面**

^① 参见英译本第 66 页与第 84 页（即前述“前摄经济、永久革命与贡献”与之后的“前摄经济”节——译者注）。

^② 关于我使用该术语的含义，参见英译本第 29 页及之后（即“柏拉图与无产阶级”节及之后——译

游戏 (jeu d'écritures),而这种资本幻象所促成的预期系统,预设了一种自由资本的存在:当自由资本察觉到利润下降时,其结构上必然倾向于撤资^①。

这些撤资行为属于短路现象,就像人为的、导致记忆减退的记忆——即书写这一“药剂”——会使鲜活的、具有回溯性的记忆发生短路一样^②。

我们可以提出,这种倾向会导致**漠不关心** (incurie)——人们将那些对“有利可图”的决策所产生的经济及社会后果嗤之以鼻的人称为投机者(在战时则称为“发国难财者”)。这类人属于被称为冷漠无情者、漠不关心者或粗心大意者 (incurieux) 的范畴,即那些“满不在乎”的人 (qui ne s'en ont cure),也就是与一切“毫无干系”的——那些声称“我不在乎!”的人,那些嘲弄世界的人。

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粗心大意的倾向,且这种倾向因植根于这种药理学之中而无法消除,所以才不得不设立监管体系——其目的在于限制自由资本的这种投机倾向的破坏性影响,并鉴于资本流通的不稳定性,**对事物(即投资)保持足够稳定的掌控**。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自由资本的流通本应衡量金融子系统赋予生产子系统内某一经济主体的信用——并通过这一衡量体系,树立“社会”正投资于该经济活动的信念。自由资本的流通是一种特定的**前摄性组织**,它依托于一个复杂、易出错且易腐败的**药剂系统** (pharmaka):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货币、行为与债务、各种金融工具、评级机构等元素。

然而,当这种资本不再衡量对生产设备资产未来的信心资本(作为一种预期系统,它本应据此构成投资能力),而是依赖于以下两类操作时,它便趋势于成为纯粹的投机性资本:一类是纯粹自我指涉的操作(即金融子系统创造的预期仅指向其自身,且以牺牲生产系统为代价);另一类虽以生产设备为导向,但在结构上属于短期行为(即以撤资——亦即对生产设备的掠夺——为基础)。

创新、短期主义与投机

现在让我们回到生产资本上来。

者注)

^① 虚拟资本的倾向始终是将规则减至最少,甚至完全消除规则,以便尽可能频繁地释放权力。

^② 参见英译本第41页(即“无产阶级化与药理学”节——译者注)

针对趋向下降这一论点，一个常见的反对意见是：位于生产装置核心的技术创新使该体系能够不断激发自身的差异化，因此不变资本会为创新型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然而，创新的问题不仅关乎企业家将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转化为商业实践的构想与生产过程：创新首先且本质上是创新的**社会化**——即社会的变革。在 20 世纪，这种变革是通过消费的组织化实现的，即通过建立使社会**适应**(**adaptation**)技术工业变革的装置来推动，而非社会对创新的主动**接纳**(**adoption**)。

如果技术工业变革是由社会自身共同创造的，那么这将是一个“主动接纳”的问题。但相反，消费的组织化预设了这样一种前提：社会体系的演变在结构上必须服从于经济体系的演变——这一服从得以实现的条件是，赋予后者对技术发展（即技术体系）的完全控制权。这种服从通过以下方式达成：捕获并利用消费者的注意力，将其力比多能量转移到创新客体之上，并通过市场营销控制他们的行为。

如今，这种对力比多能量的利用终将导致其毁灭：它将欲望的对象——该对象本只能通过走向无限化（即超越所有计算）才能被构成——置于计算的支配之下。

这种对欲望的毁灭会导致一种基于冲动的“挫折”，与 20 世纪消费主义社会中被熊彼特称为“经济进化”的创新社会吸收机制共同构成一个系统，进而催生了一个趋势于制造**慢性结构性过时**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与物的正常关系沦为**可处置性**^①。如果金融化构成了该体系的一个面向，那么企业（作为不变资本）和工人（作为可变资本）在结构上就会与其他任何消费客体一样成为可处置的对象。

因此，消费既成为一种权宜之计，也成为一种宣泄途径——即一种**药剂**：它通过将挫折感在极短期内转移到这种“持续创新”所制造的最新消费客体上，从而加剧了挫折感。于是，新颖性被系统性地赋予价值，而耐久性则被牺牲。这种

^① 阿尔·戈尔（Al Gore）在《对理性的攻击》（*The Assault on Reason*, New York: Penguin, 2007）第 94 页中引用了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的商业伙伴保罗·马祖尔（Paul Mazur）的话，这段话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马祖尔宣称：“我们必须把美国从‘需求型文化’转向‘欲望型文化’。[……] 必须训练人们去渴望、去追求新事物，甚至在旧事物尚未完全消费完毕之前。”

疏离的组织化——即不忠或背信^①（亦被称为灵活性）^②——促成了力比多经济的分解、基于冲动的行为的扩散，以及社会体系的瓦解。

这种不忠的系统性组织——具体表现为初级认同的消解^③、婴儿突触生成的改变^④，以及我曾描述为社会中“解离”^⑤现象的那些短路现象——其底层逻辑在于：自由资本的预期系统与消费者的高度易变行为相互协同，并形成“增效”作用（potentialisent），即如同药理学联用会增强其治疗效果与毒性（例如酒精与精神类药物或抗炎药同服的情况）。

因此，自由资本的预期与消费者行为相互关联且系统性地变得具有短期主义、投机性和基于冲动的特征。

前摄经济

虚拟资本是一个由预期与博弈构成的系统，它只能对虚幻事物作出判断——即针对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的未来可能性进行投机与计算。正是这种前摄性投射系统（作为对承担风险的结构化组织——无论风险被限制程度如何），赋予了资本主义体系以动力：资本主义预设了在上述意义上可用于投机的自由资本的存在。

然而，这种对现实的“超前”（advance）——正是它使预期在结构上暴露于投机之中——首先必须源自一种动机，这种动机本身内在于一个动机经济（同时也是一种幻想经济）：正是这样的经济生产出多变的力比多能量，或者用更精确

^① 也就是说，这与阿尔·戈尔在《对理性的攻击》中提及约翰·鲍比（John Bowlby）理论时所描述的“依恋”形成了断裂。参见阿尔·戈尔所著《对理性的攻击》。

^② 博尔坦斯基（Boltanski）和夏佩洛（Chiapello）分析了这种灵活性对婚姻生活造成的影响。

^③ 我在《关怀青年与世代》（*Taking Care of Youth and the Generations*, trans. Stephen Bark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中试图阐释这种破坏是如何发生的。

^④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Frederick J. Zimmermann、Dimitri A. Christakis 和 Andrew N. Meltzoff，《2岁以下儿童的电视及 DVD / 视频观看》，《儿科与青少年医学档案》（“Television and DVD/Video Viewing in Children Younger Than 2 Years”，*Archives of Pediatrics and Adolescent Medicine* 161 (2007), pp. 473-9.）；以及 Dimitri A. Christakis、Frederick J. Zimmermann 等，《儿童早期电视接触与后续注意力问题》，《儿科学》（“Early Television Exposure and Subsequent Attentional Problems in Children”，*Pediatrics* 113 (2004), pp. 708-13.）

^⑤ 参见英译本第 37、48 页及之后，以及第 59 页（即“无产阶级化即知识的丧失”节、“论工作”章中“关联与解离问题...”段，以及“这一切导致了普遍的不负责任...”段——译者注）

的精神分析术语来说，生产出**多形态的力比多能量**。

这种多态性必须由马克斯·韦伯所称的“精神”加以统合：它预设了一种对力比多经济的投入——这种投入以某种方式赋予其象征校准，并使其在一个形成多形态社会交往的交换体系中获得建构。

这些便是贯穿《新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与伊夫·夏佩洛（Eve Chiapello）在书中既援引马克斯·韦伯，也援引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观点，旨在表明：

（施加于资本主义体系内所有参与者的）系统性约束本身并不足以唤起他们的参与。强制约束必须被内化并合理化。^①

换句话说，它预设了一个力比多经济储备着**可交换的力比多能量**——这种能量赋予该系统对自身的“超前”以连贯性，并将其作为动力，贯穿于该系统所引发的各种动机形式之中。

在力比多经济中，这种“超前”——该经济的前摄性结构^②——由欲望所构成，而这种欲望在结构上是无限的，即不可计算的，因为它倾向于将其对象“无限化”：力比多经济正是这种无限化的经济，并因此构成一个本质上的长期关怀系统。

相反，这种基于欲望——即基于符号资本——的超前的破坏（其对象的“有限化”及作为其内在可处置性的组织所引发的破坏，包括劳动者与企业在内），摧毁了一切形式的动机本身。

因此，它成为一种基于驱力的超前。但鉴于驱力在本质上具有短期主义特征，

^① Luc Boltanski and Eve Chiapello,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Gregory Elliott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2005), p. 10. 我在《怀疑与失信 3：资本主义失落的精神》（*Mécreance et discrédit 3. L'esprit perdu du capitalisme*, Paris: Galilee, 2006）中试图表明，为何博尔坦斯基与夏佩洛未能将欲望把握为这样一种经济，以及为何他们同时未能描述消费主义的力比多经济及其导致的困境。具体而言，他们未能分析生产装置、力比多能量装置的消解效应，更普遍地说，未能分析与社会及符号装置相联结的精神装置的消解效应，因此他们对情感关系灵活性的描述缺乏（理论）后果性。

^② 正是因为力比多经济具有前摄性，并且资本是一种前摄性预期生产的组织，所以资本主义才成为一个力比多经济的时代。

这将导致投资消退——即作为**收益**的盈利能力遭到破坏，亦导致作为系统活力与持续性之巩固（即**对系统有益**的因素 [ce qui fait du bien au système]）的盈利能力遭到破坏。

消费主义资本与「猴子货币」(monnaie de singe)：失序的数学化

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化所特有的生产主义体系（及其引发的数次危机）中萦绕不去的趋向下降问题，在二十世纪初的北美被一种反趋势所消解——这种反趋势通过消费主义对力比多经济的组织得以实现：通过建立一个由资本从消费端引导的前摄性预期系统，该系统与在此意义上被投资并“前摄化”的自由资本形成功能性的直接关联。消费主义社会的建立，正是美国经济对这一系统性趋势的主要回应——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形态无法仅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来阐释。

正是在这一新兴语境中——当生产主义工业模式转向消费主义时——熊彼特于 1913 年写下了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化理论。福特主义则构成了熊彼特所称的“企业家”这一理想类型的完美范例（韦伯本人曾通过宾夕法尼亚企业家的形象为此理想类型提供了首个版本）^①。但基于泰勒主义的福特式企业创新，预设了大规模消费的组织——即对力比多能量的利用和剥削，以服务于持续的行为控制。正因如此，这种资本主义形态需要动用弗洛伊德的概念。

这种消费主义反趋势——其诞生本是为了对抗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并通过一种马克思未曾意识到的系统功能（即市场营销）得以实施，该功能不仅导致了虚拟资本的重组，还使生产控制方式从企业家控制转向股东管理——而这种反趋势在 20 世纪末又转而走向疲软，且恰在购买力普遍衰退之际，引发了大规模贫困化进程，重现了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

在摧毁了其赖以建立的力比多经济之后，消费主义反趋势继而系统性地加剧了金融药理学的毒性——即虚拟资本那种基于驱力且具短期主义特征的趋势，这一趋势不仅加剧了各阶层人口的贫困化，还破坏了生产装置；后者正通过杠杆收购及其他专门针对企业的投机手段遭到掠夺。

对趋向性下降的对抗，进而引发了力比多能量的趋势性衰退，这又强化了资本的投机倾向（即其投资消退趋势），从而削弱了利润本身。因此，资本的巨额

^①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London: Unwin, 1930), p. 71.

积累往往会蜕变为猴子货币（monnaie de singe）——而养老金基金体系也暴露了其本质：它是所谓“虚拟资本”系统的一极，该系统将其失序的药理学倾向数学化；其另一极则由蓄意制造的责任稀释骗局（leurre）构成，这些骗局有著“次贷”“证券化”“伯纳德·麦道夫”等种种名号。

短期主义微观趋势

如果说马克思计算利润率的方式未能充分考虑虚拟资本本质上所包含的投机倾向，这恰恰表明，资本主义投资体系作为一个动态系统，**要么**受制于一种疲软倾向，**要么**受制于一种必然变得具有破坏性和虚假性的投机运作。

熊彼特通过揭示创新如何**功能性地衔接**生产资本与虚拟资本（即作为以“技术价值”为导向的风险资本），对这一视角提出了反驳。但熊彼特既未将消费作为对力比多能量的驾驭这一问题纳入分析，也未探讨这种驾驭对消费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能量形式（即力比多能量）所引发的疲软效应，更未论及这些效应在虚拟资本中不可避免地催生的短期主义失序倾向的强化。

因此，为了描述生产装置的运作——鉴于其由持续创新所驱动，而这种创新需要由市场营销所构成的心理力量装置对消费的组织（即便我们从马克思那里沿用其在利润率计算中对虚拟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区分）——我们需要：

1. 在他的公式中加入创新函数与消费函数，以描述这样一种生产装置：它如今已不再仅仅是生产主义的，而是消费主义的；

2. 纳入力比多能量的趋势性衰退，即力比多分解为其组成性驱力的倾向。

此外，如果承认：

- 虚拟资本对该系统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可计算预期的组织；
- 它在结构上由一种短期主义倾向所构成——即在消费主义工业模式中，这种失序倾向与以下要素共同构成一个系统：1) 创新和技术转移进程的持续加速所导致的产品与服务日益过时的趋势；2) 与之相应的市场营销的激进性；

由此显而易见的是，消费主义模式已触及自身极限，因为它助长了一种**短期主义的宏观趋势**。这种趋势若持续至未来，只会导致系统对任何可能的未来彻底封闭——即造成企业或金融领域的预期进程阻塞，并引发社会心理动机的普遍退化，**经济动机的衰退**亦不可避免。

鉴于这种宏观趋势的存在，问题随之变为：何种**宏观反趋势**可能存在？

作为系统性模式的股东资本主义

除了耐久性、可持续性以及将资本主义作为动机系统加以维护的动态系统等问题之外，还必须加入负外部性问题：2008 年危机恰好印证了梅多斯报告（Meadows Report）与勒内·帕塞（René Passet）的预言——即消费主义工业模式注定会因破坏地质资源、地理与气象系统，同时引发人口爆炸，而突破自身极限。

这种对物理系统的破坏，与对心理和社会体系的破坏相互叠加——而后者正是所有力比多能量（包括生产者、设计者、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力比多能量）的生产条件。此时，**利润率**必然趋势于零，而“利润”之所以能维持在高位，仅仅是因为它在本质上已沦为投机性与失序性并存的产物——要么通过具有破坏性的金融药理学工具实现，要么通过直白的类似黑手党的操作达成（这些操作显然具有犯罪性质且完全非法）。

在此情形下，被放大的是一种与利润率（用 p 表示）所计算的利润不再有任何关联的收益——因为面对创新本身终将过时的命运，并考虑到消费本质上基于驱力的特性，资本在结构上趋势于成为虚拟资本，即不再与支撑公式 $s/(c+v)$ 计算的定义中的 c （不变资本）或 v （可变资本）相关联：这种趋势具体表现为股东导向的管理模式的盛行——福热尔/欧洲航空防务与航天公司（Forgeart/EADS）内幕交易丑闻已揭示出其灾难性后果——并催生了一种真正的系统性失序。

过度经济（dém mesure）与无限责任

尽管这种虚拟资本可能具有投机性，但它衡量预期，使其具有相对的可计算性。然而，心理社会时间的前摄并非完全可计算，且始终超越相对预期：它们源自一种自我无限化的力比多经济，即一种**过度经济**——这种经济生产心理意志

（或称“动机”），即生成**生存动机**（或称“意义”），并预设了西蒙东所称的跨个体（transindividual）——后者建立在跨个体过程（transindividuation）之上，在前摄被精心编织为长回路形成的过程中得以展开^①。

换句话说，构成心理社会时间性的前摄预设了这样一种情况：**无限责任的承担**将作为一种**信用**形式来“支撑”这种时间性——在这种信用中，信用无法被简化为被理解为计算的信任 [confidence]^②，而是预设了一种投向可无限化对象的欲望。

正如韦伯所言，在资本主义起源之际，改革后的一神论上帝承担了这种无限责任的象征功能。但当资本主义演变为一个祛魅、虚无主义与上帝之死的过程时，何种力量能承接这种无限责任的象征功能？这种与无限的关系又将以何种形式存在？——投机活动往往倾向于稀释并清除这种关系（然而，正是系统本身通过这种方式被稀释：损失的共担只会让社会体系与心理体系通过进一步自我摧毁来吸收这种稀释，即通过自我稀释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金融子系统，而这始终以损害生产子系统为代价）^③。

这个无限对象即欲望的对象。弗洛伊德与尼采让我们思考的——而且他们将其作为倾向的博弈让我们思考的——在这位维也纳分析师所称的精神装置的运作中，**心灵**本质上由它与无限性的关系所构成。这种无限性即无限欲望的对象，它虽不存在（仅为一种幻想），却依然构成实体而存在。

唯有这种连贯性允许普遍经济（general economy）得以延续，即超越投机的有限性——当投机活动通过计算和衡量预期来运作时，其本质上的失序便暴露无遗，因为它已成为短期主义（即基于驱力的）倾向的化身，而这种有限性正是在此过程中显现。这也是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所述的普遍经济的核心议题。

从美国资本主义通过市场营销的精神权力，将“美国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新

^① 这正是菲利普·贝罗（Philippe Béraud）与弗兰克·科尔梅莱斯（Franck Cormerais）试图以“社会价值”（valeur sociétale）之名探讨的内容，而科尔梅莱斯还将社会创新问题与之结合。

^② 这一点在《怀疑与失信 1》（Mécréance et discrédit 1）第 95-107 页和第 120-124 页有进一步阐述。

^③ 法国电信员工的自杀潮是一场悲剧性现实，它揭示了创新与生产体系以及精神个体的共同毁灭——而没有这些精神个体，一切将不复存在。

的力比多经济加以实施的那一刻起，它只能通过将无限欲望这一无限性进行有限化处理来使其运作，即通过摧毁力比多能量的生产装置以及所有升华的副产品来实现。因此，这必然导致自身的功能失调。

然而，这种精神权力的实施——其本身同时信奉软实力学说——将长期通过凯恩斯理论化、罗斯福具现化的公共权力来缓解其有限化效应。这种被称为福利国家的公共权力将：

- 一方面，在精神权力之下维持用于生产力比多能量的社会及升华体系，尤其是教育体系；
- 另一方面，公共权力将通过承担调控与调节的角色，限制精神权力所强化的虚构资本投机倾向——这些倾向源于工业技术体系持续突变引发的失调效应，此类突变正不断动摇其他社会体系的稳定。

换言之，福利国家不仅是生命权力的化身：更叠加了精神权力的维度。这正是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所谓文化工业时代国家的特质——当这些作为美国生活方式载体的产业，开始争夺社会变革主导权的历史时刻。

所谓“保守主义革命”，实则是技术体系从属于经济体系的状态

此处必须强调三个关键点：

- 1、在营销与虚构资本掌控工业进程之前，在大众传媒彻底驱力化运作之前——即 20 世纪 70 年代年代初——企业利润率已跌至谷底。这个经济事实意味着，当时很难断言利润率趋于下降是一个荒谬的观点。
- 2、正是为了扭转凯恩斯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造就的局面，玛格丽特·撒切尔自 1979 年在英国、罗纳德里根自 1980 年在北美推行了这场“保守主义革命”——彼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于 1971 年遭弃，美国的生产装置如昔日大英帝国般急剧衰退。这场革命旨在将西方资本主义“金融化”与全球化，以维系其主导全球化进程的能力（然而这一战略终成可悲败局）。
- 3、此番对国家的质疑——以谴责福利国家摧毁个体责任能力为名，进而宣称政府本身“即是症结而非解方”（套用里根的描述）——其根本目标在于：使资本得以全权主导（经由

营销实施的精神权力中介) 伯特兰·吉尔意义上的技术体系与其他人类体系间的失调进程。这项自工业革命伊始直至彼时始终归属政府的调节职能, 终遭褫夺。

换言之, “保守主义革命”之后, 技术体系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演进——这一进程由生产基础设施、消费组织架构(经由心理技术)及消费对象与服务(三者皆已工业化与技术化)共同构成——催生出 1989 年后再无阻碍的经济全球化。全球技术体系之演变, 正趋于全面融入经济体系, 既屈从于其优先法则, 亦受制于其矛盾律。

此外, 经济体系自此几乎完全由业已全球化的金融子系统主导——而该金融子系统自身, 又与生产子系统形成结构性去关联。

技术体系、社会体系与市场营销

从拿破仑时代的国家到各种形式的凯恩斯主义, 再到戴高乐主义, 国家始终承担着关键职能: 引导并规制技术体系加速演进引发的失调, 并在必要时实施再调节进程。伯特兰·吉尔曾在 1978 年——即撒切尔执政前一年——指出: 若缺乏这种构成工业发展政策的规制, 社会体系终将被技术发展的无序性所吞噬^①。

技术体系作为动态系统, 承载着西蒙东所描述的个体化进程。吉尔指出, 在此个体化过程中, 技术体系会规律性地与其他社会体系发生冲突——这些社会体系本身即是集体个体化的进程, 并且以心理个体化过程, 以及弗洛伊德所称的精神装置为前提。

这意味着, 技术体系的个体化有可能以一种与社会体系和精神装置的个体化相悖的方式展开。然而, 这种对立性也构成了技术、社会与心理个体化进程的动态机制, 即其个体化的药理学条件: 西蒙东指出, 个体化作为过程, 预设了相位差(dephasages)——正是这种相位差引发了这些不同的个体化动态, 反之亦然。

另一方面, 心理与社会个体化进程无论如何都不是社会体系和精神装置对技术体系演变的被动适应: 它们是接纳的过程, 即共同个体化(co-individuation)

^① Bertrand Gille, *Histoire des techniques* (Paris: Gallimard, 1978), p. 77: “如今已不再是被动承受技术进步及其成果的不确定性, [...] 不再是不管愿不愿意都要接受技术领域发生的一切, 并勉强进行必要的调整。在所有领域——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皆然——未来都必须被组织起来。”

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体系与精神装置既参与自身各自的个体化，也生成并个体化技术体系，且这一过程以转导性地相互关联的方式发生。

吉尔认为，国家必须承担起对（必然且必要的）冲突的调节责任，以避免这些系统遭到破坏：国家通过协商、预测和规划——即通过对技术与工业发展进程的长期组织——来确定技术体系的参数及社会体系的相关演变，从而实现调节；国家还必须确保独立于私人投资的研究之可能性，因为与跨代的社会时间相比，私人投资具有短期主义特征。

这类政策实为治疗术，其基于长程跨个体化回路来界定个体化机制，并规定相应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技术与工业药理学更倾向于促成个体化而非去个体化。

现在，保守主义革命中的新自由主义者所发动的意识形态战争的一个关键方面，在于对政府产业政策及长期规划的谴责，以及相应的指控——政府必然会推行低效的经济治理模式，尽管美国军方一直主导着美国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这一指控最终演变为：**所有**生成长程跨个体化回路的社会结构，均被指责为遏制了技术体系发展所促成的现代化进程。

当撒切尔和里根发起放松管制、拆除并最终清算所有国家机构时，他们的赌注在于：这些调整进程可完全交由市场机制——即市场营销——独自运作，而这种机制随后会**无限制**地利用构成媒体基础设施的心理技术，并以此服务于一种“麻醉性”的行为控制——这种控制具有麻醉作用，且会使人产生依赖。

将技术体系与经济体系混为一谈，视为失序的主要因素

这种**无节制的**剥削导致**力比多能量的生产装置**缓慢却不可逆转地走向瓦解——**该装置由精神装置与社会体系结合而成，旨在生成升华系统**（并在个体化进程中始终同步具现心理性与集体性双重维度）。2008 年秋，这种无节制的剥削终将引发一场真正意义上**行星级的失序**。

将技术体系与经济体系混为一谈是一场灾难，它必然导致这两个完全具有药理学属性的系统得到强化，并加剧其毒性、熵增和自我毁灭倾向——原因有四：

- 1、技术体系从属于经济体系（而经济体系本身又被高度投机性和短期主义的金融子系

统所主导), 这强化了创新及其加速进程对其他社会体系的破坏效应: 技术体系不断与社会体系失调, 并用等同于服务的技术流程来替代这些社会体系, 以掩盖、压制和延迟这种失调的影响——这些技术流程绕过了社会体系所组织的跨个体化过程。缺乏规制, 最终会导致那些无法立即“货币化”(即无法被消费市场吸收)的时间性(长程回路)遭到破坏。

2、技术在不同社会体系(家庭体系、教育体系、政治体系、司法体系、语言体系等)中极快速且剧烈的渗透, 导致了普遍的无产阶级化: 技术创新通过市场营销被强加为精神个体与社会个体的适应过程, 而非作为个体化的载体和界定治疗机制的接纳过程——即**生活智慧**(治疗与关怀作为自我与他者的技术)。正因如此, 它不再允许跨个体化回路的创建, 相反将跨个体化过程的短路设定为原则——这等同于一种系统性失序的原则。

3、虚拟资本和股东管理对完全从属于经济因而从属于市场的技术体系的发展施加短期主义的压力, 对于该技术体系而言, 唯一被选择的发展可能性是那些能够**迅速形成偿付能力**的可能性——从而关闭了对其药剂(pharmakon)层面进行长期社会投资的所有可能性, 也关闭了将其社会化作为治疗性实施的可能性——经济系统对技术体系的这种压力, 导致**技术体系本身**陷入系统性失序的发展。

4、地理、生物、人口与心理体系陷入失调, 导致其失衡, 而非引发有益的扰动(即那些能有效产生负熵的扰动, 能够引发新的亚稳定性形成的扰动, 正如药剂若得到治疗性应用时所可能发生的那样)。

动机系统的崩溃

人类的生成是三重个体化过程的结果, 技术体系、社会体系与精神装置作为亚稳定构型, 催生了技术、集体与心理个体化进程。这三种个体化过程不可分割: 它们形成了转导关系^①。

这些转导关系将三个必须加以区分的技术体系层面联系在一起——它们各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趋势, 但不可相互孤立地看待:

- 精神装置植根于身心器官的系统之中;

^① 转导关系是吉尔贝·西蒙东阐述的一个概念。在转导关系中, 关系的各项元素是通过关系本身而构成的, 并非先于关系存在。

- 技术体系连接着人工器官，这些器官成为心身躯体的药剂，将该躯体与社会体系核心中的其他躯体相连接；

- 社会体系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使跨个体实现亚稳定化，并那些通过集体个体化过程构成社会凝合的治疗性制度。

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处于转导关系中，这意味着它如果没有与其呈外源性关系的人类环境便无法发展——这一环境由精神个体与集体个体构成，这些个体通过培养一致性（即并不存在却具有无限性的对象）来培育自身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类对象所具有的无限性，才使得系统与个体之间在无限未来中持续趋于统一成为可能。

精神装置与技术体系处于转导关系中，这意味着精神装置如果不通过构成技术体系的**药剂**便无法实现社会化——技术体系也是一个第三持存系统^①，从而支撑着个体与集体的前摄（及信用的形成）。这些**药剂**既允许长程跨个体化回路的形成，也允许短程跨个体化回路的形成。

与之相反，社会体系作为集体个体化进程（即作为演化系统），如果不通过这些社会体系核心中实现跨个体化的精神个体来接纳**药剂**，便无法实现自我维系——这些**药剂**会瓦解社会体系赖以存续的组织：每个器官学层面的个体化皆与其他系统的个体化处于转导关系之中。

然而，在二十世纪，经济体系超越了所有其他体系，并肩负起**通过将它们有限化**（即让其服从于普遍的“货币化”进程）来实现统一的任务——而金融子系统又超越了经济体系核心的生产子系统——此时，构成三个器官学层面真正共同个体化条件的无限一致性（欲望法则）却遭到了破坏。如今，没有无限一致性，便不存在“可持续的”（即审慎的〔关怀性的〕）前摄。

这导致所有预期都被压缩进超短期的投机视域，同时动机系统也随之崩塌。投机远不是催生新的动力，相反，它将时间固化：冻结为一种时间岩壁，令过去与未来在此相互湮灭，使所有投资形式分崩离析。完全放松管制的虚拟资本所具有的超短期倾向，系统性地短路了跨个体化进程，从而使虚拟资本走向总体化与极端化。这种倾向本质上是自我毁灭的，如此这般毁灭时间——时间，其法则本

^① 参见英译本第 140 页（既之前的“正是因为力比多经济...”注释——译者注）。

是欲望（因其允诺通过升华实现想象动机的可能性）。

这种缺乏审慎的状态——它只会导致三个器官学层面的熵增解体，同时摧毁超器官学系统（地理、气候、地质和生物系统）——是由消费主义模式引发的。这种模式通过扩散分裂的环境（即无产阶级化的环境）达到了自身极限^①，从而演变为自我毁灭的模式，因为它所摧毁的不仅是消费者的欲望，还有他们的健康。

工业经济的重塑预设了一种力比多经济的重建——没有后者便不可能有投资。这意味着必须构想并建立新的力比多能量生产装置——因为此类装置必然属于制度性存在：因此便有了教会机构及其审慎的（curieux）栖居者（神父），因此便有了学校及其主导者（教师）。

要重新构建经济逻辑，即对抗资本作为药剂所固有的缺乏审慎的倾向，进而实现对世界的关怀，显然不能再通过“刺激消费”的路径。但它也无法通过“减少增长”（décroissance）来实现。相反，必须重新找到一条通向真正增长的路径——这种增长与消费主义所导致的畸形增长（mécroissance）截然对立^②，且它应成为欲望复兴的载体。这种重生将通过践行一种贡献式经济来实现——在这种经济中，“经济”（economize）意味着“关怀”（take care）^③，而“关怀”本身则培育着共生的环境^④。

技术倾向的药理学

在民族志研究过程中，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André Leroi-Gourhan）通过跨族群比较，提出了其所谓的“技术趋势”（technical tendencies）概念。技术趋势源自于“族群”所构成的“内部环境”（interior milieu）之中。源自族群的技术趋势以技术客体形式投射，其整体构成一层“膜”（或称“薄膜”），族群借助这层

^① 参见英译本第 37 页（即“无产阶级的药理学”章-“无产阶级化即知识的丧失”节-“这种分离实际上是构成劳动环境之跨个体化结构的断裂...”段——译者注）。

^② 关于“畸形增长”，参见 Christian Fauré, Alain Giffard and Bernard Stiegler, *Pour en finir avec la mécroissance*, Paris: Flammarion, 2009), pp. 20-21.

^③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工业之艺”研讨会《寻找新武器？》（*Trouver de nouvelles armes*）：
<http://www.arsindustrialis.org/le-séminaire-trouver-de-nouvelles-armes-collège-international-de-philosophie>

^④ 参见前述“这种分离实际上是构成劳动环境之跨个体化结构的断裂...”段及贝尔纳·斯蒂格勒与工业之艺所著《重新魅惑世界：精神价值对抗工业民粹主义》（*Réenchâter Le monde: La valeur esprit contre le populisme industriel*, Paris: Flammarion, 2006), pp. 49-55。该书即将由 Continuum 出版社推出英文版。

膜掌控外环境，并通过技术客体实现对外环境的同化。

勒鲁瓦-古尔汉的分析既深受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启发——他明确承认这一点，并援引了“生命冲力”（*life force*）理论——同时也受到克劳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的影响。后者运用“内环境”（*interior milieu*）、“外环境”（*exterior milieu*）以及“膜”（*membrane*）与“细胞”（*cell*）等概念，以描述社会族群的“代谢”（*metabolic*）功能。

如今，技术趋势形成的“内环境”同时也是**限制**其具体表达的对抗趋势的发源地。内环境“分泌”了这些趋势，但它也生成类似（自身）免疫系统的机制，以对抗这些趋势有时可能在其内环境中引发的毒性效应。

事实上，这是通过一个支撑它的技术环境构成的——该环境既是其存在条件，也是其双重性（如果允许我如此表述的话，取该词的双重含义）：由内环境所容纳并支撑的技术环境（相当于伯特兰·吉尔所称的“技术体系”），既持续超越内环境，又以毁灭威胁着它，仿佛一个既是其寄生对象之可能性（与不可能性）条件的寄生者。简而言之，这涉及一个药理学意义上的环境，其承载的趋势兼具药性与毒性。

这就是为什么，在内环境中，一种技术趋势尽管源于该环境，却从未在其中得到完全表达：技术趋势仅通过技术事实得以实现，而技术事实是源自该趋势的技术特征与勒鲁瓦 - 古尔汉称为技术事实层级^①的族群特征之间的折中——这些层级的第一级是“纯粹趋势”，但它会被其他层级覆盖、遮蔽，限制其表达，甚至使趋势的技术性反作用于其自身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一种显性内容（即技术事实）与隐性内容（即技术趋势）——显性内容唯有通过**遮蔽**（*dissimulating*）隐性轮廓、使其**延迟**（*différant*）并使自身与之**差异化**（*différenciant*），才能表达后者的潜在轮廓。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内环境（构成族群的基础）在技术环境中容纳了一个社会子群体（技术群体）——后者是技术趋势的承载者，并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区别，而其他社会群体则承载着源自其他社会体系的反趋势。一种社会反趋势的作用在于促使技术趋势发生“分散”、偏转，甚至逆转其方向，以确保技

^① 参见 André Leroi-Gourhan, *Milieu et techniques* (Paris: Albin Michel, 1945)。

术趋势不会摧毁构成内环境的那些系统——如果技术趋势毫无限制地表达，这种摧毁将不可避免。因此，承载技术群体的趋势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互动中具体表现为技术事实，而其他社会群体通过促使该趋势分叉来把握它。

这种偏转、衍射及其衍生的分叉结构——这些正是德里达所称“延异”（亦为一种经济）^①的特定表现形式——构成了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共同个体化过程的现实性；通过这一过程，既先行预示又实际实现这些体系的心理体系，在受制于它们并发现自身为其限定的同时，也完成着自身的个体化。

然而，与内环境的这些保守反应形成对比的是，倾向于促进技术趋势表达的技术群体，相比族群更具超前性——因为它对外部环境的元素极为敏感。

我们必须 [.....] 首先将其理解为一种自然环境——它是无生命的，由石头、风、树木和动物构成，但同时也承载着不同人类群体的器物与思想。^②

因此，技术群体正是通过来自外环境的物品与思想（这些为技术人员所同化的媒介），促使技术趋势（其本质不过是一种潜能）付诸行动（或曰“越界”[passer à l'acte]），并借此领先于内环境。然而，内群体不得不自身同化这一技术环境，以便能够同化其外环境中已发生变化的事物——勒鲁瓦-古尔汉以阿拉斯加因纽特人因气候冻结而采用雪鞋为例证明了这一点：在此，一切均关乎动态体系之间的协调。

作为对宏观下行趋势之逆转[renversement]的贡献式经济

人类群体特有的技术趋势^③既定义了人类本身，也威胁着人类本身：这些趋势威胁着使群体凝聚统一的凝聚力因素。技术趋势源自族群本身。勒鲁瓦-古尔汉所说的“技术环境”相比“内环境”可能更具超前性，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① 参见 Jacques Derrida, “Différance,” *Margins of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2)。

^② Leroi-Gourhan, *Milieu et techniques*, p.334.

^③ 这些趋势是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物理力量与生物力量。关于这一主题，参见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 George Collins and Richard Beardsworth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这些趋势在所有人类群体中均有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具有普遍性。所有群体都蕴含着这些趋势，但每个群体均以自身的方式将其具体化——具体而言，即通过以特定方式使这些趋势个体化，并通过这些趋势实现自身的个体化。

这种超前性源于这一内环境，并在某种意义上通过**掏空**这一内环境而实现。另一方面，在吉尔的论述中，技术体系及其动态似乎趋于外化，脱离内环境，并与社会体系去关联：这正是吉尔所称的“失调”。

吉尔所谈及的社会已不再是族群和部落群体：它们是规模大得多的社会群体（帝国、经过政治与经济组织化及层级化的城市、教会、民族国家等），其社会结构与族群的社会结构相距甚远，且被划分并区分为若干子群体、社会阶级、经济部门等。

在这些等级社会中，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形成一种统一体（帝国的、政治的、宗教的、民族国家的，等等），仿佛这些“族群细胞”相互整合，构成了一个更高层级的整体，形成了新的内环境。此外，此类等级社会彼此之间维持着商业与军事关系，进而催生了一个日益强烈“人类化”（即技术化）的外环境：一个属于交流与“对外贸易”的环境，国际法可能从中形成——这一环境时而呈现为经济场域，时而锐变为战争场域。

失调体现于城市化引发的空间分化之中。但自工业革命以来，它才成为社会动态中可感知且持续存在的因素。彼时，技术体系倾向于覆盖并吸纳社会体系，首先通过将技艺之道（*savoir-faire*）刻入机器（即知识的文码化），继而在消费主义时代通过支撑服务行业的设备绕过生活智慧（*savoir-vivre*）——当代网状社会正通过社会工程将社会关系本身文码化。

在人类社会此前的所有时期，始终存在着使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去关联的过程，而技术环境也始终超越于内环境——古希腊人将此特征化为一种**傲慢**（*hubris*）形态。但在过去一万年的定居生活与城市化文明中，这类因技术体系个体化的“骤变”而引发、并扰乱社会体系及整体集体个体化进程的过程，始终属于例外性事件。

自工业革命时期起，失调便成为一种长期现象。而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初变得更为显著——当时，工业界为应对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系统性地组织了一种持续创新的形式，这种创新以消费主义社会的发展为前提，并依赖于生活方式的系统性和持续性转变。

从那时起，技术体系不仅不再看似由族群所孕育——这种情况始于族群“细胞”与其他类似“细胞”整合以形成更复杂社会体的时刻——事实上，技术体系

似乎在这个复杂社会体内逃向了一个新的内环境。这便是**解离**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社会体系不再通过偏转和个体化技术趋势以占有它，相反，社会体系自身因社会的技术化而被绕过，甚至被直接解体。

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系也通过金融化和对技术体系的控制，与其他社会体系去关联，技术体系因此成为去领土化的载体。技术趋势不再源自内环境，也不再由内环境孕育——因为内环境已不复存在：技术环境落入一个本身高度去领土化和全球化的技术体系的掌控，导致内环境被单纯地稀释，仿佛被寄生——并被毒害。

这因而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极限——因为内环境的稀释同时也是精神装置的解体，以及力比多能量和投资、预判与意志能力的彻底耗竭。根据一般器官学原理，一个剥离了内环境的技术环境，是一个剥离了心理社会个体化过程的技术个体化过程；鉴于它摧毁了自身的能量基础——力比多能量（这种能量是一切前摄活动的必要条件），并且由于技术趋势在技术事实中得以实现（这些事实正是这些趋势的物质表达）^①，因此这必然是一个趋于熵增的过程。

到达这一阶段后，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及其衍生的消费主义和投机性的反趋势，共同催生了一种最终变得不可持续的宏观下行趋势：这便是我们的处境。为了**逆转这一趋势**，（资本）必须通过对网状社会特有的关系技术的投入，经由新型内环境（由“细胞”群体构成）的个体化，重构技术环境的个体化进程。

这种基于新关联环境所形成药理学治疗术，即贡献式经济^②。

趋势的器官学及其转导性配置

三种器官学层面各自具有其特有的趋势与反趋势，但这些趋势与反趋势配置并维系着三个层面之间的转导性关系：

^① 技术趋势化为技术事实却无相应的精神能量支撑——译者注。

^② 构建这一经济模式势在必行——首要在于，集中式网络模型（电话总机控制的电信网络、电力中枢主导的能源分配、消费主义框架下的采购中心产销体系）已在众多领域被重构，并因纯粹理性让位于贡献式网络。就能源经济而言：集中式模型已难以为继，能源体系正转型为双向流通网络，正如杰里米·里夫金所预言：随着贡献型能源生产的引入，一种新型基础设施得以诞生——兼具逻辑性与网状化特质，即所谓的**智能电网**。

•在身心交互层面，基于驱力的及升华性的趋势与反趋势展开作用，二者的妥协形态构成了一种力比多经济——这种经济在时间进程中每次都具体化为特定的心理结构——它通过配置药理学的可能性，并通过**药学术**物投射至社会层面，使心理个体化同步转化为集体个体化，并形成跨个体化的循环回路；

•在技术与药理学层面，技术趋势持续展开，而这些趋势仅在作为技术事实遭遇由其他社会系统引发的反趋势时才得以具体呈现——正是这种遭遇，使技术体系自身被贯穿、激活、结构化并实现个体化，这种遭遇始终通过精神个体实现，它们将其心理个体化纳入集体个体化之中。

•在社会层面——即组织化与制度化的集体个体化层面，趋于亚稳定化以实现同步化的种种趋势（同步化是社会层面总体统一性的条件），与历时化趋势既协作又对抗；这些历时化趋势持续冲击着经由集体个体化形成的亚稳定结构，这一过程的动力源自于精神个体，这些心理个体通过其与**药学术**及技术趋势）的关系而个体化，并在历时性维度上独特化——只要社会层面衍生的治疗性空间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正是通过这些多层趋势的配置，使跨个体化进程得以编织而成。每一个社会体系本身均由特定趋势所构成，这些趋势体现了同步化与历时化的动态交互，并形成其自身的跨个体化循环。

然而，随着每一次新的文码化阶段的出现，新的同步化进程（即新的亚稳定机制）得以启动。但自文码化进程使物质流的离散化成为可能开始——这继而使其通过机床、生产-管理-设计设备，最终通过协调消费的心理技术（使计算“意识流”成为可能，即“可用脑时间”）进行计算——经济体系便通过控制技术体系本身，超越了所有其他的社会体系：即控制从技术趋势所开辟的前摄场域中筛选可能性，并将可行的技术事实强加于虚拟资本，而虚拟资本本身又凌驾于生产资本之上。

文码化——即药理学本身——却也正是激活新的历时化进程——亦即个体化进程——的条件。面对前几段所述的宏观下行趋势——这一趋势相当于源自三个器官学层面的趋势的负向配置，我们必须重新激活人类社会内在的跃升（*elevation*）趋势；在文码化的特定阶段，这种趋势曾通过记忆辅助药剂（*hypomnesic pharmakon*）转化为休养（*skhole*）与闲暇（*otium*）的恒定性文化。

提升趋势——“尽管存在诸多替代方案”

在每一个文码化阶段，社会都会构建起治疗性体系、关怀体系以及关于自我与他者的技艺。它们构成了从萨满教模式到艺术模式的灵性样态和多元的理智形式，其间历经教会、医学治疗、学校、体育、哲学以及所有升华体系。

这些体系作为培育恒定性趋势的具象化形式，必然预设了与之相结合的生计的生产装置，并通过该装置形成一种霸权——这种霸权作为商业，同时也是对现有存在与未来存在的算计。因此，相互结合的是恒定之闲暇、生计之操劳（negotium），以及构成名副其实之生存的要害——通过这些要素，一种可被称为“存在”的生活智慧得以形成。

贡献式经济是通过重新构建基于当代**药理学**的关怀体系来激发欲望，并由此构建服务于新型存在方式的生计交换体制

在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配置、组合并协调各种趋势与反趋势——这些趋势与反趋势编织并亚稳定化了在三个器官学层面上形成的动态系统。这些配置通过将发生在这三个层面的趋势与反趋势推向“升能态”（potentialisant）^①而形成。由这些配置所引发的动态历史进程，既源于先前阶段的局限，又在与自身局限的遭遇中被持续改变。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刻——一个极其严峻的时刻：人类的存续本身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20 世纪末，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虽受到利用力比多能量的反趋势的抵消，但最终导致了**心理体系的基于驱动力的趋势与经济系统的投机趋势**的结合。然而，在数字网络创造的新药理学语境中，一种相反的**配置**显然已变得可想象：人们可以设想**投资趋势与升华性趋势**的结合。

这些配置预设了经济系统与心理装置在组织层面和心身层面的双重衔接。这些衔接在技术系统层面通过引导为技术趋势而得以转化，更确切地说，是通过经济系统与心理系统共同选择的技术事实类型来实现——这些技术事实是技术趋势的具体表现：技术系统中最终得以表现的技术趋势并非一种决定性因素，正如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并不决定资本主义的终结——并且，技术现实的关键在于事实本身，而非趋势。另一方面，技术趋势开启了多种可能性，正因如此，针对“TINA

^① 斯蒂格勒借用化学术语表达“趋势被催化放大”的涵义——译者注

意识形态”^①，必须以“TALOA 论点”^②予以反驳。

趋势是内在于事物内部的潜能，从中可以筛选出各种可能性：它们开启了前摄性的可能领域。被选中的可能性随后会作为技术事实具体呈现，但这些技术事实始终经由社会体系而被导向。另一方面，社会体系自身目前正卷入一场争夺集体个体化控制权的斗争。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在于，由虚拟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强加于一种技术体系之上，并将其演化描述为必然——这种必然性据称不仅适用于国家职能的瓦解，还适用于所有长期跨个体化循环的清除（这正是撒切尔和里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倡导的，也是萨科齐和贝卢斯科尼在 21 世纪头十年仍在推行的）。但事实上，此类配置是历史性的，且具有完全的偶然性——更有甚者，它们极具毒害性。

从驱力性虚空到趋势倒转

这套技术体系的极端自由主义参数最终导致了 2008 年的灾难，其导向完全受制于短期利益，即通过市场营销组织和制造的技术事实——而这种营销否认长期趋向的存在：这种“管理型教条主义”^③宣称，唯有市场才能指引流变（*devenir*），即使这种流变最终不再有任何未来（*avenir*），也在所不惜。

那些主张并要求否认长期存在——最终否认时间本身（即独特性的个体化、存在）的人宣称，技术性未来既无法预测，也不可能构建任何形式的政治意愿或将其变为现实。但这种对预期的贬低——就其自身逻辑而言与所有投资形式相矛盾——实则是基于技术事实与技术趋势之间的混淆。

勒鲁瓦-古尔汉确证了技术发展的可预见性，条件是我们领悟：由技术趋势引导、推动和驱动的发展会被“衍射”并偏转至技术事实之中——这些技术事实在短期内可能看似完全与该趋向相悖（正如一条河流的水流，在极小的尺度上观察时，可能看起来明显是自东向西流动，而实际上它是自西向东流动，因为所观察的部分是一个漩涡，产生了相反的水流），甚至可能持久地阻碍该趋势（现有

^①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即“别无选择”——译者注。

^② “There are lots of alternatives.” 即“存在多种选择”——译者注。

^③ “管理型教条主义”这一概念源自皮埃尔·勒让德（Pierre Legendre）的《统治世界：管理帝国》

（*Dominium Mundi, L'empire du management*, Paris: Mille et une nuits, 2007）。

技术可能会被用来抵消承载该趋势的新技术)。

这种明显的矛盾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技术事实是技术趋势与社会体系之间的折中产物——社会体系本身即是由构成其亚稳定系统的趋向与反趋向所形成的组织^①。于是问题便转化为:公共权力如何能够在不将所有社会体系简化为经济体系的前提下(因为这会将欲望消解为纯粹的可计算性),创造出能够重建长期视角、预期、投资等的调节机制。

这种以市场取代商业的失序性趋势目前占据主导地位,它源于三个器官学层面上趋势与反趋势的有害结合。这种倒退趋势的有毒经济,由消费主义通过心理技术的中介行使其文化霸权的精神权力所推动,以此控制个体与集体行为的演变,以及技术体系的动态进程。跨个体化循环的破坏同时导致了构成人类群体的那些内在环境的消解。

用博尔坦斯基和夏佩洛的术语来说,“内在化”(intérioriser)资本主义及其运作,前提是内在环境尚未被完全消解——否则,将不再有任何内在化,而只有导向驱力性虚空的纯粹外在化过程。这正是利润率的趋向性下降及其消费主义反趋势所带来的系统性消极后果(包括产生巨大的系统性愚蠢^②)。

系统性失序的趋势不可根除:尘世乐土从未存在,永难企及。必须构筑一种失序经济学——借由培育关怀体系来组织,这种体系以药理学智慧为前提,以此具体表达一种生活艺术,编织多元治疗网络。然而,我们的时代极为特殊:与以往任何时代不同,它竟将失序奉为其组织的根本原则。这是再也无法容忍的。

这便是我们面临的紧迫性与挑战——全球性且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普遍的基于驱力的虚空面前,进行一场宏大的趋势颠覆。

作为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新型关系的贡献式经济

在技术趋势的影响下,技术体系的演变——尤其是在工业化到来之后,并通

^① 亚稳定系统是一种处于平衡与非平衡边缘的动态系统,吉尔贝·西蒙东指出,个体化过程构成了一个通过这种亚稳定性调节的动态系统。参见吉尔贝·西蒙东:《心理与集体个体化》(*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Paris: Aubier, 2007),即将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推出英文版。

^② 参见英译本第45页(即“论工作”章-“在这些流程中,神经系统的劳动力正日益被无产阶级化...”段——译者注)

过机器、装置等极为特殊的技术客体——贯穿于一个通过功能整合而得以实现的具体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多种功能基于单一功能得以建立，该单一功能因而具有多功能性。

吉尔贝·西蒙东特别结合热机分析了这一演变过程：他的首个例子是从驱动蒸汽机活塞的外燃（炉膛）到气缸内部燃烧的转化过渡——当勒努瓦发动机（Lenoir engine）取代蒸汽机在热机序列中的地位，燃爆气体在气缸内的膨胀力直接推动活塞运动^①。

另一个功能整合的案例出现在西蒙东所谓的与技术体系运作相关的技术地理环境中。西蒙东结合甘巴尔涡轮机（Guimbal turbine）发展了这一理论，他指出：海洋元素被功能整合到发动机中，从而成为一种与之关联的技术地理环境。其他形式的技术地理环境则并非严格与技术体系直接关联，而是通过在技术体系与地理环境之间形成中介的技术进行适配，进而构成技术地理环境。例如，一片土地的地形轮廓经过改造和技术化处理，以便纳入铁路网络，并使机车能够适应这些地形轮廓：在此情形下，铁路网络构成了地理系统与技术体系之间的界面。

1990年，菲利普·艾格林（Philippe Aigrin）与我提出以下观点：软件产业及其数字网络终将催生出新型的关联技术地理环境，使人类地理能够与技术系统形成交互界面，并通过这种交互使其运作——更借此推动其演进^②：协作技术与自由许可软件恰恰建立在对这类关联人类环境的价值化之上，这些环境同时也构成了形成正向外部性的技术地理空间。

这一过程是在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的交互界面形成的体系之间的宏观趋势，这推动着两者之间的功能整合——但这种整合未必是有益的：它具有高度的药理学特性，例如，社交网络显然也与自动化追踪过程相关联，这类追踪由网络参与者在大多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产生的行为和请求所启动，但却为获取这些信息的人赋予了一种新型权力。

在此，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交互界面并非通过经济体系运作，而恰恰

^① 参见吉尔贝·西蒙东：《论技术物体的存在模式》（*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aris: Aubier, 1989），第20-23页，即将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推出英文版。

^② 当时我们与阿兰·吉法尔（Alain Giffard）合作，并为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的发展协会工作，旨在开发“计算机辅助阅读终端”。

是通过那些承载社会所拥有**知识**（savoirs）的社会体系来实现。这类知识形式及其价值化，是我们对抗“**无知识的信息**”生产的唯一可能途径。发展它们并对其进行经济性的价值评估，将促使一种新的经济体系从社会体系的核心中涌现，而尊重这些社会体系，即意味着构建一种贡献式经济，以对抗系统性失序的经济。

（全书完）